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信使

2018年第4期



人权  
回到未来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ISSN 2096-4064



9 772096 406172

# 发现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信使》!

## 扫描订阅数字版本



100%  
免费

<https://zh.unesco.org/courier/subscribe>



### 以十种语言出版

阿拉伯语、中文、英文、世界语、  
法文、葡萄牙文、俄文、撒丁语、  
西西里语和西班牙文。

欢迎各位伙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  
提议新的语言版本。

Contact: [i.denison@unesco.org](mailto:i.denison@unesco.org)



### 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开放获取出版政策，积极鼓励其传播和使用。

<https://zh.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



### 订阅印刷版本

144元/年 (共4期)

288元/两年 (共8期)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359101

邮编: 100044

#### 2018 年第 4 期 1948 年创刊

《信使》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季刊，旨在通过分享对国际相关事务的观点来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信使》出版作出慷慨资助。

主 管: 文森特·德富尔尼

主 编: 雅斯米娜·萨波瓦

制作与推广主任: 伊恩·丹尼森

副 主 编: 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维罗妮卡·费多尔钦科

责任编辑: 陈晓蓉

数字编辑: 马拉哈·伊布拉欣莫娃

图片编辑: 达尼卡·比耶利亚茨

数字建筑师: 丹尼斯·皮扎利斯

媒体关系: 蕾蒂西亚·凯西

行政及编辑助理: 卡洛丽娜·罗兰·奥尔特加

实 习: 多米蒂耶·卢克斯

编 辑:

- 阿拉伯语: 安妮莎·巴拉克
- 汉语: 孙敏、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 英语: 习拉兹·西德瓦
- 法语: 雷吉·梅朗
- 俄语: 玛丽娜·雅尔采娃
- 西班牙语: 贝阿特里斯·胡埃斯

翻译 (汉语): 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

设计: 科琳恩·海沃斯

封面插图 © Fernando Bryce

合作出版版本:

- 葡萄牙语: 安娜·露西亚·吉马良斯
- 世界语: 黄银宝
- 撒丁语: 迪阿古·克莱因
- 西西里语: 大卫·帕雷诺

免费阅读电子版: <http://zh.unesco.org/courier/subscribe>

印刷版: <http://unesco.org/eshop>

咨询与版权问题: [courier@unesco.org](mailto:courier@unesco.org)

7, place de Fontenoy, 75352 Paris 07 SP, France

© UNESCO 2018



使用条款: 本刊经“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 国际政府组织 (CC-BY-SA 3.0 IGO)”授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igo/>) 可开放获取。若引用该期刊内容，需接受并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获取资料库的使用条款 (<https://zh.unesco.org/open-access/terms-use-ccbysa-chi>)。

现授权限仅为文字内容，若使用图片，需事先申请许可。

期刊所载内容若涉及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当局的合法地位，以及涉及边界界定，皆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所刊文章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点，本组织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主管单位: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总 编 辑: 张高里

执行主编: 刘永淳

编辑部主任: 刘香玲

责任编辑: 王 梦 王克蒙

通信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100044

电 话: (010) 68359101 (发行部)

68359719 (编辑部)

邮 箱: [huangli@ctph.com.cn](mailto:huangli@ctph.com.cn)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市邮政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电 话: 0086 10 64258884

邮 箱: [export@cnpic.com.cn](mailto:export@cnpic.com.cn)

国内统一刊号: CN 10-1517/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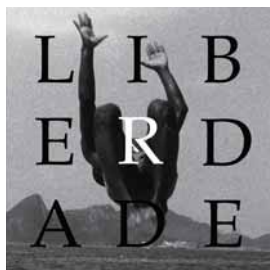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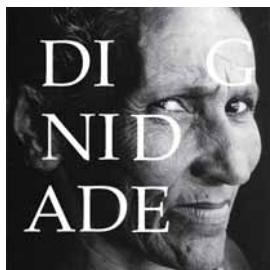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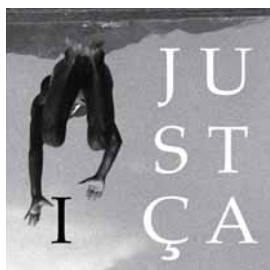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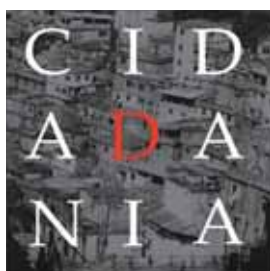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2096-4064

定 价: 36.00 元

## 信使

“不同文明体系封闭隔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人们在人权观上的分歧也不复存在了。”

胡马雍·迦比尔(1906—1969年)  
印度诗人、政治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研，  
1947—1948年



© Françoise Schein (www.francoiseschein.com)

《世界人权宣言》无疑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之一。它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的第一项有关道德价值的国际条约，70年来，它一直是“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共同标准。”人权委员会和《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宣言通过前一天——1948年12月9日于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这样说道。

虽然《世界人权宣言》被尊为一份独特的人类宪章，成为我们在谈及维护世界各地人民的尊严时重点引用的文献，但它仍不能免于受到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引发了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争论。

尽管《世界人权宣言》在形式上确实受到西方传统的启发，但在实质上，它的原则是世界通用的。“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都应宽容和尊重个人尊严。”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 1997—2006年任职)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庆典上说。这位加纳外交家于2018年8月18日去世，我们向他致敬。

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在讲话中曾说：“为了‘纪念’，要有‘记忆’。我们不能不带记忆地行动，不过，为了不负先辈，我们在行动中，必须记住的不是时间、地点或信函中的文字，而是声音、颜色、感受或当时的精神。”

这也正是本期《信使》的目标：重新发现这个时代的精神，以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对当今人权问题的反思。“广角”精选了几篇用于答复一项人权哲学基础重大调研的文章，该调研由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于1947年发起。

《公民身份、团结、正义、尊严、自由》是比利时艺术家弗朗索瓦丝·沙因拍摄的一组数码蒙太奇照片，她自视为“人权艺术家”。

60多名杰出的思想家响应了这个年轻组织的号召，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便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罗忠恕和胡马雍·迦比尔(Humayun Kabir)等。

“这样一个项目开展得非常及时，因为世界人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全面战争动摇了社会整体结构。各国人民都在寻求基本人权问题的共同解决方案。”负责协调该项目的雅克·阿韦(Jacques Havet)在1948年8月的《信使》中写道。这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称，对该问题的或言简意赅、或长篇大论的答复，代表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群体和思想方法”。

在过去70年里，世界的确经历了巨大变化。许多民族摆脱了殖民束缚，许多文化传统自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后得以重现。然而，教科文组织发展以对世界文化的广泛了解为基础的全球哲学的努力至今不失其时代性和有效性。

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编了对“人权：评论和解读”这项调研的许多答复，以“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更好地了解对方。”雅克·阿韦说道。

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采用同样的方式，由于版面有限，在这里我们只能重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47年收到的几百页内容的一小部分。虽然我们的选择无法展现这个项目的全貌，但我们希望它能为读者提供一些精神食粮，以助思考。

本期《信使》杂志的赠刊收录了费尔南多·布赖斯(Fernando Bryce)的约50幅画作；正刊刊登了对他的采访(见第53页)。这位秘鲁艺术家受到1948年至1954年《信使》杂志的启发，创作了“需求之书”系列画作。这个名字取自教科文组织1947年出版的一本书，该书评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损失，以及全世界人民在这些方面的需求。

#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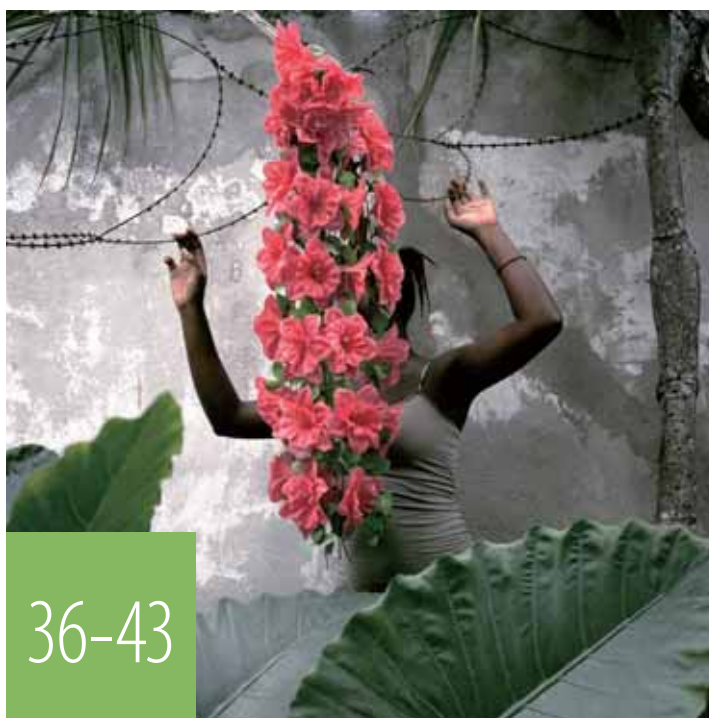
## 广角

- 5** 70年前的观点, 至今不失现代性  
马克·古德尔
- 9** 一场关于人类尊严之原则的辩论  
贝内德托·克罗齐
- 11** 打破个人主义僵局  
哈罗德·拉斯基
- 14** 经济和社会权利  
莫里斯·多布
- 16** 击败自由之敌  
阿道司·赫胥黎
- 18** 信息是自由思想的工具  
勒内·马厄
- 20** 教育: 人权之本  
艾萨克·利昂·康德尔
- 22** 个人权利和文化共存  
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
- 25** 印度的人类自由观  
什里克里希纳·文卡塔斯·帕塔姆贝卡
- 28** 儒家的人权之道  
罗忠恕
- 30** 被殖民者的人权  
伦纳德·约翰·巴恩斯
- 32** 人权的神圣性和普遍性  
阿诺德·勋伯格
- 34** 人权和文化视角  
莱昂内尔·维尔, 安娜玛丽·德桑杰

## 影像



- 吉塞勒·玛丽·维维亚娜等百万女性**  
摄影: 贝内迪克特·库尔津  
文字: 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44-51

## 观点



教育之于移民：  
不可剥夺的人权  
丰斯·库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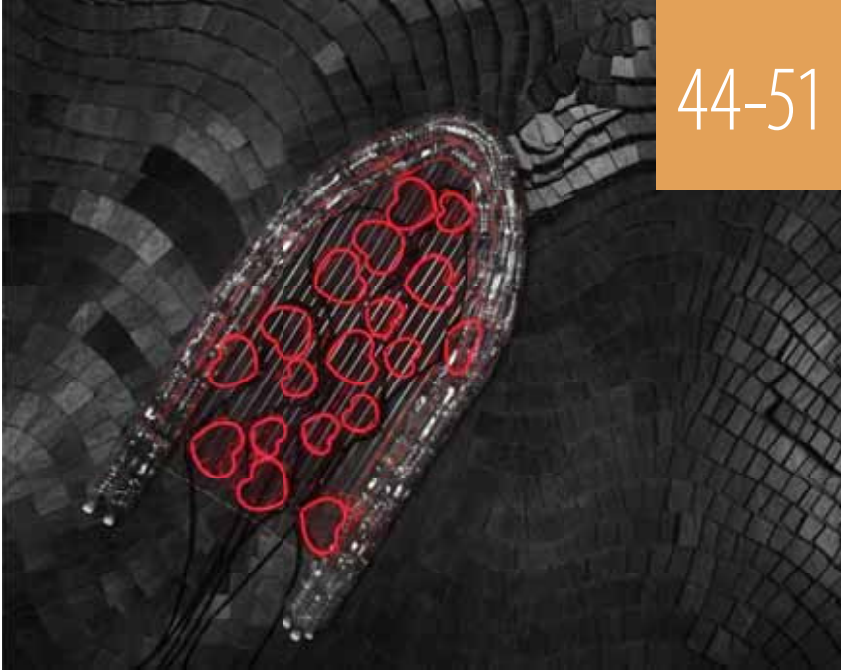
45

协助教师援助难民  
杰奎琳·斯特雷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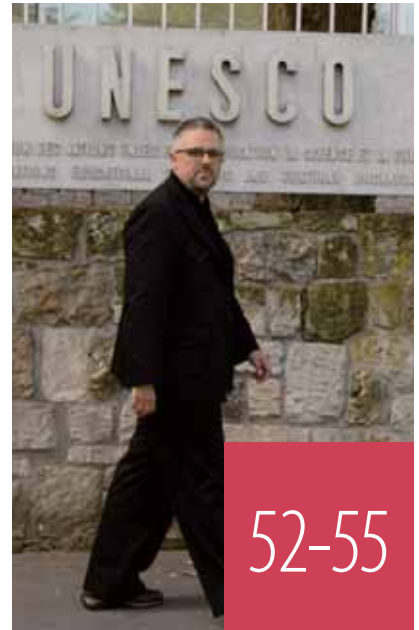
48

使用移动技术，缔造新生活  
克里斯托夫·皮默，范胡华

50



56-65



52-55

## 嘉宾



费尔南多·布赖斯：历史现在时  
卡洛丽娜·罗兰·奥尔特加，露西亚·  
伊格莱西亚·昆茨 担任采访



66-68



## 时事

57

摩苏尔，拥有  
两个春天的城市  
伊纳姆·卡沙希

62

SESAME：  
中东科学成就  
阿奴·艾尔-邹比供稿

60

阿尔弗雷多·孔蒂：  
遗产出租：两全其美？  
弗雷德里克·瓦舍龙 担任采访

65

教科文组织在乍得湖畔  
阿涅丝·巴尔东

## 《信使》创刊

### 70周年!

纪念我的祖父桑迪·科夫勒  
奥雷利娅·多斯



# 人权： 回到未来

广角



海报由巴西籍设计师爱德华多·苏亚雷斯·戈麦斯（Eduardo Soares Gomes）设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纪念“国际文化和睦年”，于2010年举办的“文化举足轻重”海报设计比赛获奖作品展上展出。

© Eduardo Soares Gomes



# 70 年前的观点，

# 至今不失 现代性

马克·古德尔

1947 年至 194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政治领袖、神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士开展调研，征询各界对于人权哲学基础的看法。这项调研在当年并没有被广泛宣传，但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并非一日之功。从制度层面看确实如此——建立机构和总部、招募工作人员和任命负责人都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战后新秩序面临的这些“实际”困难不容低估。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成立后最初的 12 年里，总部设在巴黎第 16 区的马热斯蒂克旅馆，卧室和浴室充当办公室，文件就放在壁橱和浴缸里。

从政治层面看，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建立更是复杂。章程和宪章从总体上厘清了各国际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但这些机构之间早期的实际交流互动，毫不夸张地说，可谓含混而模糊。



1948 年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两年之后联合国纽约总部工作人员的孩子正在细看宣言文本。

要理解国际体系在这一时期的背景情况，千万不要用后来者的眼光去看待这段早期历史。我主张用“时代的眼睛”去重新审视那段发展形成期。这能让我们认识到，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处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还将或多或少地始终面临这种动荡不安的境况。

这种观点用在人权领域尤为贴切。1945 年，尚在萌芽阶段的国际社会正面临两大问题。其一，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被殖民主义割裂的世界，应该如何组建国际社会，是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背景下继续盛行“现实政治”，还是确立一个新的平等主义模式，根据新的政治阵营和地缘界线重新分配权力？



“我认为，在世界普遍意义上，权利和自由似乎并不存在……在全球层面将权利与自由对等不可能不存在歧义和误解……我更相信只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需要解决——找到施虐和侵略的根源并根除，在没有为此采取行动之前，空谈人权毫无意义。目前，我们整个人类集体还处于野蛮阶段，没资格享受任何人权……”

赫伯特·里德 (1893—1968年)  
英国艺术史学者、哲学家、诗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立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联合国这一体系除了持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之外，还反映并合法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某些国家的实力是强于其他国家的。

其二，这与第一个问题有关，但更为复杂。鉴于全球冲突期间发生的惨剧，此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屠杀和破坏才过去了20年，国际共同体该作出怎样的道德声明，才能充分表达集体的愤慨和对于建设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无论这个希望多么渺茫）？

1945年《联合国宪章》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或者说为回答这个问题作了一个良好的起步。《联合国宪章》审视了种族灭绝和帝国军国主义造成的惨祸，“重申了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与价值之信念”。

人们当时并不知道，要让“基本人权之信念”落到实处需要开展哪些工作。正如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所指出的，几大强国构成了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系统的核心，它们不愿看到任何新的组织对其政治和法律特权构成威胁（无论这种威胁多么抽象）。不过，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称之为“国际权利法案”的文件还是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促使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在1946年设立了国际人权委员会（CHR），该委员会共有18名成员，由埃莉诺·罗斯福出任主席。

尽管如此，人权委员会制定人权法案的实际程序却依然没有公开。具体说来，在1946年，人们并不知道人权委员会是如何确立制定人权法案所依据的道德、宗教和哲学原则的。这些原则应具有普遍性，不能对任何国家、地区或文化传统予以特权。但是应该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则呢？

## 前所未有的办法

就在这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了一项大胆的举措。我们不应忘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受争议、但富有魅力的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为这个新组织撰写了一份长达60页的发展规划，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宗旨和理念体系”（1946年）。赫胥黎在文中提出，需要有一个国际专门机构来帮助世界各国克服众多分歧。

赫胥黎认为，只有通过文化理解、教育与科学合作，逐步完善他提出的“世界哲学”，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在赫胥黎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将成为这个独特的国际机构，负责将他笔下的“具有自身思想体系和思想背景的单一世界文化”变为现实。





© PEJAC (www.pejaces)

不出意料，新组织秉承着这种高瞻远瞩、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巴黎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一届会议。除了选举赫胥黎担任第一任总干事之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确定了未来一年的多个重要优先事项，其中之一是指示秘书处“阐明可以作为现代人权宣言基础的原则”（第一届会议大会记录，1946年）。

这正是赫胥黎希望完成的任务。在他看来，在人权领域开展决定性干预行动，将迅速确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联合国系统主要机构的地位，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战后国际体系的支点，发挥独特的作用，成为他所谓的“统一且合一”的全球文化的保卫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负责开展这项工作的是哲学处，这个部门在成立之初是哲学和人文研究小组委员会，由一位年轻的法国哲学家雅克·阿韦领导，他当时刚刚出版了一本颇受好

评的康德论著（《康德和时间问题》，1947年）。阿韦之后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个人权项目中起到关键作用，但人们直到最近才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多大。

赫胥黎和阿韦感到时间紧迫。他们担心罗斯福领导下的人权委员会高调开展的各项工作会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权活动黯然失色，于是立即着手制定一套程序。起初的几项计划都搁浅了，最终，他们决定完成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向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政治领袖、神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其他人士开展调研，从而确立人权的哲学原则。

为此，他们编写了两份文件。一是备忘录，其中介绍了各国人权宣言简史，概述了起草国际宣言的重要利害关系；二是罗列人权和自由具体内容的清单，要求受访者据此作出答复。

照片中为西班牙艺术家佩贾（Pejac）于2016年在克罗地亚里耶卡的一座废弃电力厂的窗户上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伪装》。该作品是对比利时艺术家勒内·马格里特的致敬。

1947年3月至4月，教科文组织向知名的社会机构、国家组织和个人发出150—170份调研，最终收到约60份答复。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些答复在全面性上都不及预期，但该人权调研记录下了各界人士对于人权问题的广泛见解，可以说比人权委员会提出的观点更广泛、更多元。

## 裁 决

在阿韦的领导下，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6月底在巴黎组建专家委员会，负责评估各界提交的答复，并编写一份提交给人权委员会的报告，以便后者能够将教科文组织的调研结果作为制定人权宣言的基础。

专家委员会成员包括 E·H·卡尔 (E. H. Carr, 主席)、理查德·麦基翁 (Richard McKeon, 报告员)、皮埃尔·奥格 (Pierre Auger)、乔治·弗里德曼 (Georges Friedmann)、埃蒂安·吉尔松 (Étienne Gilson)、哈罗德·拉斯基 (Harold Laski, 见第 11 页)、吕克·索默豪森 (Luc Somerhausen) 和 罗忠恕 (见第 28 页)。他们讨论了调研结果, 并在 1947 年 8 月将结论送交人权委员会。与此同时, 专家委员会还对能否将其中部分调研答复集结出版的问题进行了商议, 在此基础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后编辑出版了《人权: 评论和解读》(1949 年)。

另一方面, 在 1947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联合国会员国都无法确定到底应该由哪个机构负责起草人权宣言。赫胥黎和阿韦建议, 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牵头机构开展调研, 或者至少也应与人权委员会密切合作。1947 年 12 月, 人权委员会终于在日内瓦召开闭门会议, 审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 但迎来的却是一片混乱, 甚至是愤怒。

显然, 人权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开展这样一项调研。委员会最终以八票对四票 (一票弃权) 决定, 不向成员国分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 也不将这份报告纳入《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程序。

## 写给未来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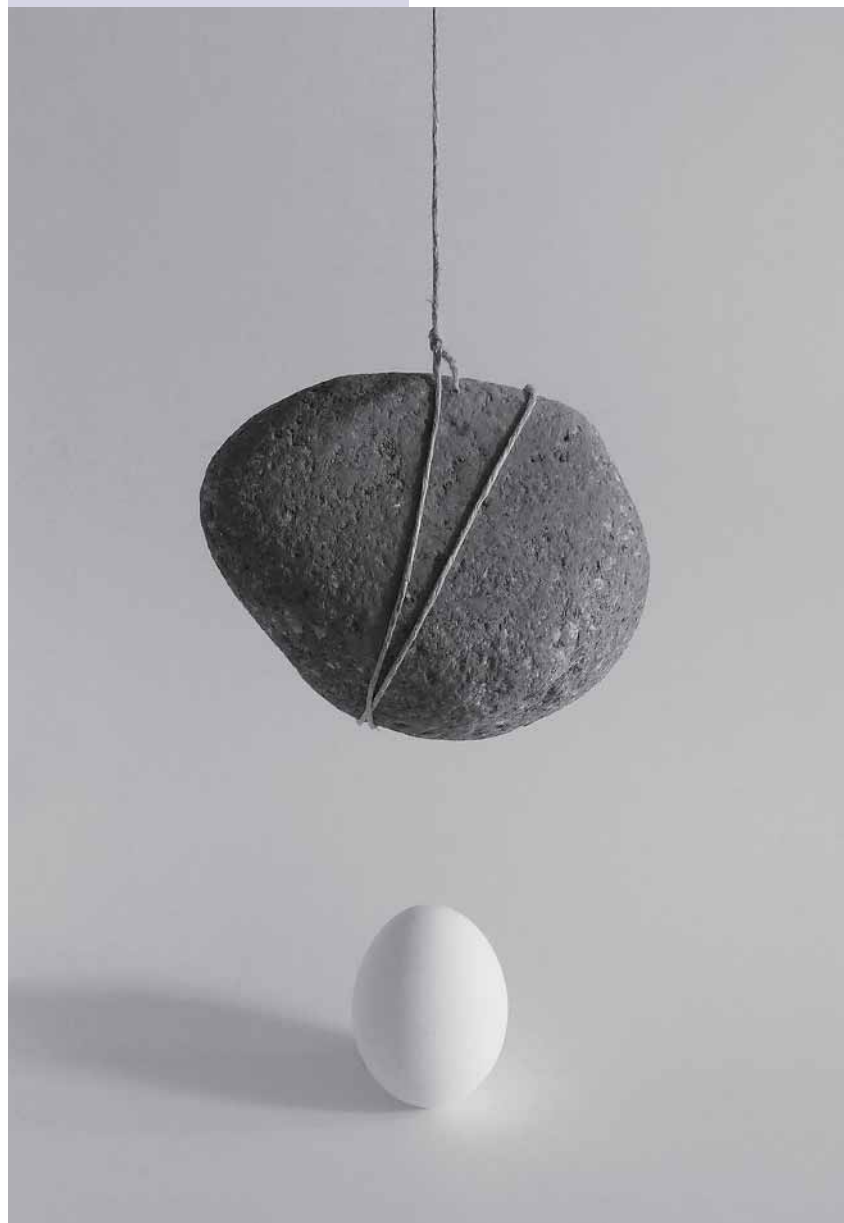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47 年至 1948 年开展的人权调研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但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世界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的理解相对狭窄, 而在其发表之前, 是这些答复推开了一扇窗, 让世人得以窥见关于人类尊严、社会、权利和义务等基本问题的多元思考。

近年来关于这项调研的研究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重温人权历史, 回到战后

那段过渡时期, 就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思想宝藏, 应对特定期的人权危机。

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国际组织官员和活动家在面对民族主义复兴、欧洲衰落、特别是全球不平等这些当代挑战时, 竭力重申人权的合法性, 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人权调研可以为新的观点和 (至少是潜在的) 新的解决方案提供意料之外的绝佳资源。

《脆弱》是希腊设计师迪米特里斯·阿瓦尼蒂 (Dimitris Arvanitis) 斯设计的海报, 是“为明日而生” (tomorrow) 组织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 70 周年于 2018 年组织的“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海报设计比赛的参赛作品之一。





# 一场关于

# 人类尊严之原则的辩论



© Carla Accardi / Antonella Sanfilippo

## 贝内德托·克罗齐

意大利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1866—1952年）主张，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言，最好的出路是举办“一场关于人类尊严和文明之必要原则的正式、公开的国际辩论”，这样就可以“依靠逻辑、文化、教义的力量和可能达成的基本协议确保自由思想战胜专制和极权主义的追随者”。本文原题为“人类权利和当前的历史状况”，于1947年4月15日从那不勒斯寄出，是克罗齐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答复。

《消极与积极》，由意大利艺术家卡拉·阿卡迪（Carla Accardi, 1924—2014年）于1956年创作，她与艺术家弗玛·乌诺（Forma Uno）于1947年共同成立了艺术家运动组织。

人权，即人类自然的、不可让渡的权利，引自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与人权相关的宣言无不基于一种曾因多方批判而趋于灭亡的理论，即自然权利理论。这种理论在16、17和18世纪的发展自有其特定的理由，但从哲学和历史角度来看却越来越站不住脚。我们也不能从道德角度来论证这种权利，因为道德不承认除其本身以外既无义务也无权力附庸的任何权利——这不是自然事实，而是首要的精神原则。



此外，你们寄来的报告在指出人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容各异时已经暗示这一点，从而否定了将诸项权利视为普遍人权的逻辑基础，而认为其不过是人类在历史中的权利，也就是为特定时代的人类所接受的权利。因此，它们不是永恒的主张，而只是历史事实，只是反映了时代和时代中的人们对它们的需求、体现了人们为满足这些需求所作的尝试。1789年《宣言》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它体现了在18世纪欧洲文化和文明背景（理性时代、启蒙时代等）下，人们就欧洲社会（包括在美洲的欧洲社会）迫切需要政治改革达成的共识。

但在今天，不管是关乎权利还是历史需求，《宣言》的宗旨都已经无法实现，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缺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促成的一致意见。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专制极权主义思潮显然缺乏共识。虽然我手里的这份报告措辞温和，但从中确实仍可察见这种分歧。

这样的共识会达成吗？用什么方式，通过重振自由主义思潮来比较哪方的道德优越性、逻辑和说服力更胜一筹，哪方的政治智慧和深谋远虑将战胜另一方，或者是通过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让时运、战况或天意决定一方的胜利？那么自由主义不朽的思潮会从它的对立面中脱颖而出吗？后者会赢得短暂的胜利吗？

## 作出妥协是否可行？

我猜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倾向于第一种选择或假设。我自然也全身心地支持自由主义思潮的振兴，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而我本人也为此在意大利境内外奋斗了近25年。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国家现在都达到了充分承认和保障人权的程度。尽管如此，联合宣言的存在仍可为各国立法者提供指导，鼓励他们按照同样的思路，对不完整或不充分的国家宣言进行扩充和完善，使之达到应有高度。”

莱维·卡内罗（1882—1971年）

巴西法学家、随笔作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即便我的猜想正确，在你们邀请我加入的这个工作组织里，各种思潮（尤其是那两股最直接对立的思潮）的代表拥有同等的参与权利，想要以权利宣言的形式来宣布一份共同政治行动宣言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不存在这种共识，而我们必须通过对立且又趋同的努力最终取得这种共识。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是弱点所在。

我甚至认为该组织也制定不出任何不空洞独断的、折中或妥协的宣言。或许你和同事刚开始工作就发现颁布这种宣言徒劳无益并且绝无可能，甚至还会有读者嘲笑这种宣言构想和拟定者的天真（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在我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有一种有益的实践工作要做，那就是举办一场关于人类尊严和文明必要原则的正式、公开的国际辩论。在这样一场辩论中，我坚信，自由思想可以依靠逻辑、文化、教义的力量和可能达成的基本协议，战胜那些用重复性口号和诡辩来吸引公众注意的、专制和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一旦这场辩论得以举行，那么便有可能拟定出有关某些历史和当代权利及相关需求的宣言，这是毫无疑问的。宣言可以采用《十诫》这样简明的形式，如果有必要包含细节，篇幅稍长也无妨。

贝内德托·克罗齐（意大利） 哲学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普鲁士艺术学院、英国国家学术院和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克罗齐以其文学批评著称，1903年创办文化批评杂志《批评》，一生著书近70部。



# 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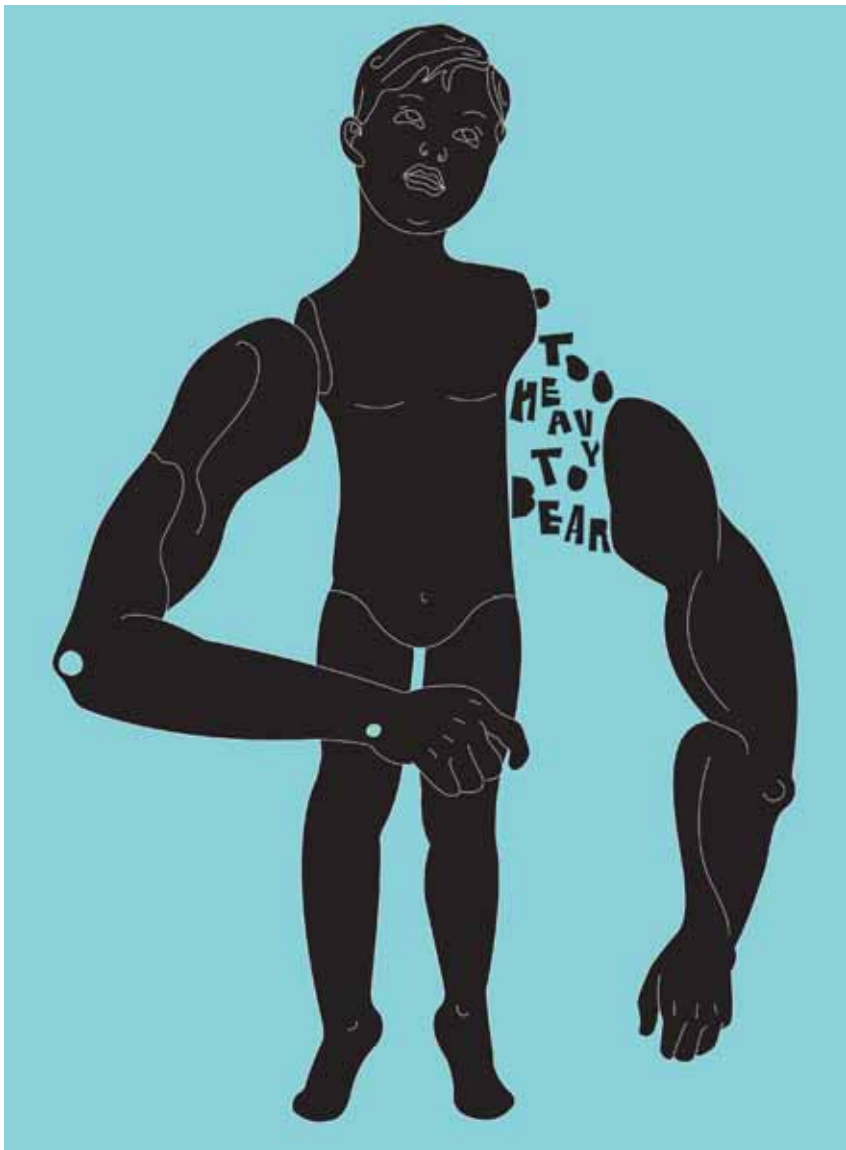
# 个人主义僵局

哈罗德·拉斯基

“联合国从个人主义角度拟定《世界人权宣言》的任何尝试必将失败。”英国学者、政治家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年）写道。他认为，要超越个人主义的立场，政府必须干预，确保其公民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利。本文节选自拉斯基1947年6月于伦敦向教科文组织寄出的题为“迈向《世界人权宣言》”的文章。

若要让这类文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和意义，最重要的是谨记过去的那些伟大宣言都是西方文明的特殊遗产，它们深深融入了新教资产阶级的传统，这一点本身就是中产阶级崛起的一个突出方面，虽然其表述呈现出普适性，但这种表述背后的实践努力很少触及中产以下阶层。

在大多数政治共同体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没有多大意义，对美国南方各州的黑人来说更是如此。英国工会1871年才实现“结社自由”；而法国，除了1848年的昙花一现，直到1884年才实现结社自由；德国直到俾斯麦时代的最后几年才实现，但也只是部分实现；美国则是通过1935年颁发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才得以真正实现，而该法本身目前在国会岌岌可危。



© posterfortomorrow 2014 - Ji Kun

《不可承受之重》，德国华裔艺术家济昆设计的海报，非营利人权组织“为明日而生”于2014年组织的“工作权利！”海报设计比赛参赛作品。

这类伟大文件宣布的所有权利实际上都是对愿望的陈述，实现与否，取决于政治共同体的统治阶级如何看待这些愿望与他们决心维护的利益之间的关系。

此外，必须要记住，过去各种权利宣言的重点之一，是假定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政府权力之间存在对立。对公民权利的构想不仅仅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还建立在政治层面上。

“让我们把人这一生主要的权利义务定义为寻求，如果可能的话，在体验中上下求索，换言之，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了解自身及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最低限度地保障享有食物权为第一人权，但最重要的人权是保障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生活。”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1886—1978年）  
西班牙工程师、作家、外交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过去那些伟大文件的撰写者，他们无意识或半意识的假设产生了更深层的问题，即政府权力每加强一分，个人自由就会减少一分。像边沁（Bentham）的著名格言“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评判者”和“每个人必须且只能算作一个人”，其根据都在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力描述的社会组织模式：其中，在任何“单纯的自然自由体系”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激烈竞争，每个人都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去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一目的，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有益于整个共同体。

即使有人辩称这种自由模式奏效过——至少是否立得住脚还很难说，但现在肯定是无效的。共同利益中的一些关键内容只能通过国家权力下采取的行动去实现，包括教育、住房、公共卫生、失业保障；依照西方文明先进社会共同体能接受的标准，若不行使政府权力，仅凭公民合作无法实现这些内容。

只要经过仔细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之间非但不存在必要的对立，在某些社会生活领域中，后者还是前者的必要条件。对于无视这一事实的当代形势，任何权利声明都没有意义。

## 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考虑到这些因素，联合国从个人主义角度制定一部“人权宣言”的任何尝试都难免会失败。在数量越来越多、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的政治社会中，假定他们需要规划其社会和经济生活，这种宣言几乎没有什么权威可言。实际上，可以进一步说，如果这种宣言背后的假设强调的是个人主义，那么这份文件将被现在正面临深刻挑战的各项历史原则的捍卫者视为对新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这份文件意在通过共同机构和共同行为标准分开探索实现的共同目标，而不是将其统一起来，这也是这种宣言想要推动的目标。



© HAVISI Boubeker (www.hamsi.be)

事实上，除非这种宣言注意到政治社会之间存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分歧，并充分考虑到这些分歧在个人和机构行为中的影响，否则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且还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试图掩饰这些分歧就等于完全忽视它们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是一个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实验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对以下事物采取的态度上产生巨大变化，包括私有财产、民法和刑法、健康和教育服务、生存的可能性（无谋生责任的某年龄段人群）、艺术（实际上是最广泛意义的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传播消息和交流思想的方式、公民在生活中选择从事某种职业的途径、在从事的职业中获得晋升的条件，以及工会制度与经济生产过程的关系。



## 统治阶级的分量

此外，马克思 (Marx) 曾说过“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一结论恰如其分，很难忽视。由此可见，从历史上看，以往的“权利宣言”事实上都在尝试赋予权利特殊的神圣性，某些特定统治阶级在其控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特定时刻，认为这些权利对该阶级成员具有特殊意义。毫无疑问，这些宣言往往以普遍适用的形式撰写；甚至它们对普遍状态的主张也能使它们在其预期有效的领域之外产生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但通常来说，在它们的适用过程中，这种普遍状态总是会变成一种特殊性，以尽可能地符合统治阶级眼中的利益，或者符合他们所认为的安全性让步的必要限制。

《人权》(1995年)，由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比利时籍艺术家布克尔·哈姆西 (Boubeker Hamsi) 创作。

## 制定一部大胆而具体的宣言

一部以这些前提和结论为基础、让全世界人民都可从中形成一项行动方案的国际人权宣言将成为有益的激励因素，促使人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长期拒绝改革有可能导致暴力革命与暴力反革命的频繁发生，更有甚者，可能产生很容易就具有全球内战性质的国际冲突。

为了能恰到好处地鼓舞人心，这样一部宣言必须在整体上大胆敢为，在具体执行上切实详尽。必须考虑到

将要出现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那些在我们眼前垂死的传统。如果制定的宣言缺乏诚意和准确性，或是试图在不可调和的社会行动原则之间寻求不稳定的妥协，那么不如不制定任何宣言。目前起草的宣言，除非得到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坚定信任和尊重，否则弊大于利。

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目睹过国际联盟的无能为力、对《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轻蔑漠视，以及对国际法和惯例的粗暴违背，经历过将酷刑和大规模谋杀作为其制裁政策的野蛮暴政，已承受不起像此次失败这样影响如此重大的另一次失败。宣言没有权利给不打算为实现希望筹备必要条件的人带去希望。倘若政治家再次破坏普通人认为的生而为人的自尊基础，那么这一文明将遭受一场难以幸免的灾难。

**哈罗德·拉斯基** (英国) 政治学家、学者、英国工党的重要成员。任教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还是许多民主和社会主义专题著作的作者。拉斯基曾积极投身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个早期项目，是最活跃、最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之一。



# 经济和社会权利

莫里斯·多布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1900—1976年）的观点，就业权、社会保障权、最低工资权、集会和结社自由权、自由就业权，这些权利都必须囊括进人权宪章，在此基础上方能构想一种新型社会。

权利宣言应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这种观念显然不切实际，在当今时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历史相对性的认识空前清醒。各种问题、需求、权利和义务只有在有一套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才有意义——社会制度和关系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当今世界，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然而，拥有进步思想的人在特定的时代会遇到特定情况和一系列特定问题，权利宣言可以提纲挈领地表达他们的愿望，指明必须推动社会朝哪个方向前进。

任何新社会的首要任务必然是实现充分就业，这在今天已是常识，但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即便如今，也有人抵制实现充分就业，或者认可这个目标却不接受实现的手段。直到最近，失业还被视为一种必然现象，伴随所谓的“自由社会”而出现；甚至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储备”，没了它，资本主义经济将缺少一种至关重要的调节灵活性和约束性的工具。在这方面，颇为有趣的是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将“劳动权利”列为“公民基本权利”中的首要权利（第118条）。

## 消除贫穷和匮乏

第二，必须保证人人有一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足以消除贫穷和物质匮乏。这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制定一套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防止工薪阶层因容易遭受的风险（事故、疾病或年老引发的风险）而丧失收入能力。其二，保障某些最低就业条件：禁止一切不能达到最低收入标准的劳动合同。这不仅关乎个人愿望的达成，也关乎就业目标的实现。不过，对每一代人来说，最低标准（基本生活工资）本身会发生变化，而且全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和历史发展水平不同，这项标准也有所差别。

在全世界广大地区，由于工时生产率水平低，任何合乎愿望的最低标准目前都无法实现（即使收入分配发生根本改变）。在这方面，切实落实该项“权利”需要将这些地区的规划发展作为一个先行条件（在广大区域，系统地将发展纳入政府赞助范畴，而不是对其采取自由放任态度；最好为发展提供外部财政援助，但前提是该援助不得附带不利的政治条件）。

## 保障人人有保障

第三，必须保障所有受雇人员的集会权和组织权。而且，要实现组织权就应当将该权利扩大至涵盖一切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使其有权就工人的雇用条件进行谈判，并有权派代表参与负责监管工作条件的机构的工作。把劳工看作是一种单纯的雇佣生产要素、在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不让他们表达任何意愿，这显然与人的尊严相矛盾。

第四，不因种族、信仰、意见或任何法律组织成员身份的不同而限制就业和谋生手段。

## 反对私有垄断

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私有制规模如此之大，以致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独立获取这些生产资料，这等同于侵犯任何完整意义上的人的经济权利。凡土地和生产设备的所有权集中在某个阶级手中，除受前者雇用外，社会其余阶层别无谋生的可能性——这体现出，事实上人们的权利极为不平等，重要的是，非所有者阶层（无产阶级）的自由被剥夺。

对人权的这种解释当然无法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相调和。





© posterfortomorrow 2014 - Bruno Raul



《工作是尊严（对雇主而言）》，玻利维亚籍艺术家布鲁诺·劳尔·里维拉·卡塔科拉（Bruno Raul Rivera Catacora）设计的海报，是非营利人权组织“为明日而生”于2014年组织的“工作权利！”海报设计比赛的参赛作品之一。

然而，如果能对这种解释作出更大范围的修正，就可以通过它来禁止私有垄断，即禁止主宰整个产业，禁止控制生产和销售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或从事生产的必备原料和必需品，因此也就能禁止向私人消费者或其他生产者发号施令。

**莫里斯·多布**（英国）学者，剑桥大学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创立者之一。

“在许多情况下，死刑的继续存在意味着，作为迫不得已的一种手段，它会剥夺个人的每项权利。”

**马杰里·弗莱**（1874—1958年）  
英国治安法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 击败自由之敌

阿道司·赫胥黎

英国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1894—1963年）分析了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建议世界性的权利法案应当作出以下努力：为满足全世界人民的需求而增加可用资源；限制那些通过财富或阶级地位统治普通劳苦大众的权力；以及更好地掌握应用科学。**他在1947年6月寄出的“**人权和人类处境的事实**”一文中阐述了这些建议，该文是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答复，节选如下。

人口给资源造成的压力与日俱增，全面战争的爆发、威胁和持续备战——这些是目前自由所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地球上22亿居民中，有近四分之三的人食不果腹。到本世纪末，（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内设法避免灾难的话）全世界人口将增加至近33亿。与此同时，地球表面大面积的土壤正被侵蚀，人类40亿英亩的生产性土地正在迅速减少。此外，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矿产资源即将消耗殆尽或已完全枯竭，这一时期，人口不断增长，消费品的需求量不断提高，而技术进步将满足这一需求。

人口给资源造成的巨大压力以多种方式威胁着自由。人们更加卖力地工作，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生活状况却越来越差。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势十分不稳定，以至于恶劣天气等小灾难都有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之时，个人自由极少或者根本不存在；当社会动荡在强有力的中央行政的干预下逐步走向秩序之时，就会出现极权主义的重大风险。

由于人口给资源造成的压力逐渐增大，20世纪便成了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的黄金时代。那时，奴隶制全面复苏，主要体现在政治异见人士、被征服人口和战俘身上。

在整个19世纪，新世界为人口爆满的旧世界提供廉价的食物，为受压迫者带来自由的土地。而今天，新世界人口众多并且不断增长，这里没有自由的土地。在很多地区，土地被过度滥用，土壤肥力不断降低。新世界仍会产生大量可出口的盈余。50年后，它是否还会有盈余来养活旧世界的30亿人？似乎这值得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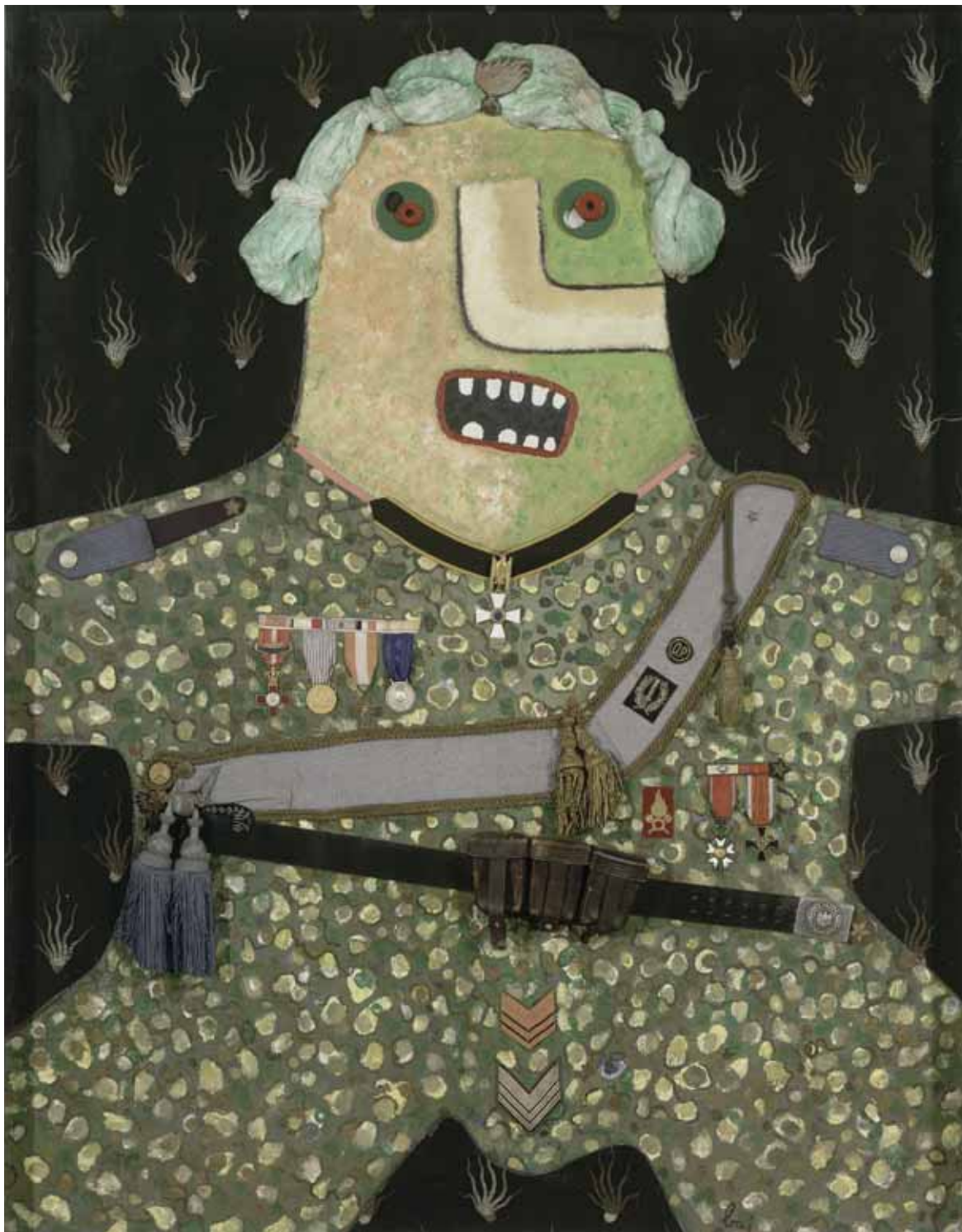
至此，应当补充的一点是，虽然整个地球人口激增，但是在西欧某些人口极度过剩的地区，人口固定不变并且即将开始下降。到1970年，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将分别减少近400万，而俄罗斯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大约7500万人口，这一事实必然会引发政治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精湛的政治才干。

所载原则在具体立法中得到应用的宪法性权利法案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普通劳苦大众，使他们免受少数人的欺压，因为这些人常常通过财富或阶级地位以权势欺压多数人。但是，防始终胜于治。一纸限令是为了遏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权力被滥用，说到底不过是减轻现有的罪恶。只有彻底消除邪恶，个人自由才有保障。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致力于推进这项工作。幸运的是，如果该组织愿意，它可以先开展一项无比重要的预防工作，那就是彻底消除自由目前所面临的障碍。这些工作主要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门负责，因为缓解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问题归属于科学和应用科学问题，而全面战争问题则是科学工作者作为个人和职业组织成员的一个伦理问题（当然，它也属于其他问题）。

阿道司·赫胥黎（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著述颇丰，尤以反乌托邦式的《美丽新世界》（1932年）著称，用讽刺的手法生动表达他对20世纪政治和科技的不信任。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1946—1948年任职）的弟弟。



© Archivio Baj Vergiate Italy / Photo © Centre Pompidou, MNAM-CCI, Dist. RMN-Grand Palais / image Centre Pompidou, MNAM-CCI



《将军》，意大利艺术家昂立克·巴耶( Enrico Baj,1924—2003年)于1969年创作的作品。他于1951年与他人联合发起了“艺核运动”——通过艺术创作来警示核技术的危险。

“科学风险曾被看作是奴役人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很明显，最近的科学进步使我们几近走出了这一迷圈。”

小威廉·阿尔伯特·诺伊斯  
(1898—1980年) 美国光化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 1947—1948年

# 信息

## 乃自由思想之工具

勒内·马厄

“信息权与所有其他权利一样：其合法内容必须根据实际需求来界定，”法国哲学家勒内·马厄（René Maheu, 1905—1975年）写道，“当然，这里对‘需求’一词的理解有条件限制，意指人类发展需求，而不是个人利益或激情需求。”本文节选自他于1947年6月30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提交的题为“信息权和发表意见权”的答复。

将信息权纳入人权不单单是为了要让公众获得更多更好的知识，还涉及对信息功能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这一举措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新闻行业的产品、工作方法，甚至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评估——不是从信息生成控制者的利益或偏见角度出发，而是从今后有理由期望信息成为自由思想工具的那些人的尊严角度出发。

从信息被视为人权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能再容忍那些把信息变成一种手段、以异化方式利用大众思想来攫取金钱和权力的体系和做法。对传递信息的人而言，信息成为了一种社会功能，应服务于解放思想。

信息权是受教育权的自然延伸，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定义其具体内容。



信息的实质内容有时被定义为“事实”或原始新闻，即没有经过解读的新闻。事实和观点之间素来存在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自有其实际意义，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在你的语言里我无法遵从》，印度艺术家席帕·古普塔（Shilpa Gupta）创作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于2018年在阿塞拜疆巴库的叶拉特现代艺术空间展出。

© Shilpa Gupta /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YARAT



“我认为，一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敦促联合国将‘人权’视为国家行为的一个最低标准，而不是将其视为固定的最高标准，并不加改变地、僵化地运用这一标准。我们想要提出这样一种观念，既然人类已经能够掌控自身行为，而且自然之力也为人类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那么人权范围就应当不断扩大。”

弗兰克·R·斯科特（1899–1985年）  
加拿大诗人、宪法专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什么是事实？事实就是证据。选择一种事实就是在间接地表达一种见解。追求绝对的客观性是根本行不通的。解放人的自由也不能寄希望于这种客观性。

信息是对素材的客观表述，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该表述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可能对信息更加完善的定义。无论是说服力还是质疑性的观点，发表观点始终具有辩驳意味。而信息的特征是其可用性，这与令人狂热的政治宣传或大众宣传不同。

既然如此，那么人们自然会问，承认人的信息权是否并不一定意味着承认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接近一切信息源？撇开事实上的不可行性不谈，这让人直接联想到的是很多为了保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最正当的政治、经济或个人利益而施加的限制。

## 切实理解相对性

宣布人们拥有受教育权并不意味着儿童有权在任何年龄以任何方式学习一切内容。这只是意味着成年人有义务根据儿童在相应年龄的需求（和能力）为他们提供成长所需的知识。权利不过是一种工具——服务于按照人类理念去培养人的工具。与需求相关的工具仅仅是工具而已。

信息权与其他所有权利一样：其合法内容必须根据实际需求来界定。当然，这里对“需求”一词的理解有条件限制，意指人类发展需求，而不是个人利益或激情需求。

就其性质而言，这些需求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人类的互助友爱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果我们只顾坚持利己主义，这种诉求便难以实现。然而，由于生活条件和发展模式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不同人类群体的需求在时间和空间的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群体并不都需要相同的信息。

在考虑人权时，我们一定要勇于将这一历史和社会学相对性要素纳入其中。对于那些必须努力让这些权利脱颖而出的人来说，这非但不会威胁到这些权利的有效实现，相反，只有根据这种相对性获得的切实理解才能赋予这些权利具体的意义。

发表意见权与历史相对性更加息息相关。相比之下，信息权必定是实现民主的条件之一，因此具有像原则一样的效力，但发表意见权属于行使民主权利的一部分，所以体现了所有政治现实或做法的相对性。一个政权若是拥有稳定制度，并且其公民可以做到以下任意一点：置身事外，保持宽容或拥有出色的批判能力，那它就是非常幸运的，并且可以为个人观点的表达提供最自由的环境。事实上，这样的政权必须这么做，因为它的首要需求就是依靠这种不可或缺的刺激来维持进步。

与此相反，深陷激情之泥潭或为轻信所苦以致民主秩序岌岌可危的国家，又或是完全致力于变革式或系统化重建过程的民主国家，它们对个人的表达自由施加诸多限制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样做必然不利于实现完全统一。

发表意见权的实现必然受特定民主国家历史观点的制约，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为国家考虑而牺牲一项人权。相反，拒绝为了一个抽象概念而舍弃一项具体事业取得成功的价值与机会恰恰赋予了这项权利完整的意义。

勒内·马厄，法国哲学家，于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伊始加入该组织，并曾连任两届总干事（1962年至1974年），每届任期六年。在提交本文时，马厄正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息自由流通处负责人。



# 教育：

# 人权之本

艾萨克·利昂·康德尔

美国教育学家艾萨克·利昂·康德尔 (Isaac Leon Kandel, 1881—1965年) 在 1947 年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与人权”一文中写道：“与常见的观念相反，自由教育并不意味着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放任自流，而是明智地承认责任与义务。”节选如下。

读一读近年来关于人权的著述，人们会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教育作为落实人权和恰当行使人权的必要条件，几乎从未被提及过。教育被忽略不提，或是由于人们理所应当认为受教育权本身是一项人权，而且是享有人权的重要基础。

然而有证据表明，受教育权既没有被视为一项人权，也没有被用来帮助人们认识到人权对于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例证在教育史上俯拾皆是。纵观历史，提供教育是出于两个目的。最初的目的是向年轻人灌输特定教派的宗教信仰。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第二个目的是培养对政治派别或国家的忠诚。这两种情况的最终目的都是强调要服从纪律，而不是开展公民应当享有的自由教育。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人权，尚未得到普遍承认，因此，务必要将教育写入今后可能起草的所有人权宣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人权备忘录》对受教育权的重视还有待提高（1947年3月27日）。

## 双重教育

传统上教育系统被一分为二，分别面向大众和精英。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是，即便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某些社会和经济阶层也会认为这些机会不是给自己的。在一些国家，要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还需要采取措施，改变教育传统造成的心理状态。

因此，亨利·洛基耶 (Henri Laugier) 在分析法国教育重建计划时写道（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教育年鉴》，第 136 页 f，纽约，1944 年）：“法国人世代生活在理论上平等、实则不然的环境中，由于生活条件尚好，实际生活中公众对此普遍接受。不平等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几乎毫无察觉，或没有因此感受到任何伤害。工农子弟不会想到自己有可能成为殖民地总督、部长、大使、海军上将或财务总监。他可能知道这些职位，但对他来说，这些职位存在于一个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世界。这种情况通常既不会激励他奋发图强，也不会让他心怀怨恨，不会激起他对权利的渴望，也不会鼓动他要求彻底改变现状！”

不过，由于涉及到人权问题，承认受教育权是一项人权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可以在不影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情况下，开办各级免费教育。初等教育的质量通常不同于中等教育；前者的目的是传授一定数量的知识，通常需要通过死记硬背来掌握，培养法国人所谓的“主要精神”；后者旨在开展自由教育或普通文化教育。对于如何行使和享有人权清单中列出的各项自由，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都没有提供任何深入细致的培训，仅仅是间接提及而已。由于大多数教育类别都受到考试的压力，让学生接受书本或教师的权威才是重点。

## 自由不是许可证

当人们从注重纪律、知识灌输和权威专制转向注重自由时，人们常常忘记自由是得来不易的战利品，任何形式的自由教育都需要借助某种学科，学习鉴别个人行为产生的道德后果。与常见的观念相反，自由教育并不意味着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放任自流，而是明智地承认责任与义务。

假如这项原则成立，就意味着教师和教学地位发生改变。假如教师的作用不再限于为学生提供在考试中会用到知识，那么详细规定的学习课程、事先规定的教学方法、检查和考试施加在教师身上的传统制约都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培养观念，而这也正是教师们乐于看到的。



© posterfortomorrow 2011 - Sarah Hartwig

在我看来，尊重绝对基本自由的一种表现是，不让儿童在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阶段就被迫产生某种今后无法消除的条件反射（心理或其他方面的反射）。尊重这种自由的一种必然结果是，必须禁止任何人将不为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所认可的内容作为毋庸置疑的绝对真理灌输给儿童。关于宗教和历史的教育的同样要符合这一标准。”

必须将这种培养工作提升到与其他任何自由职业的培养工作同等重要的高度。假如教师的努力方向是培养自由的人格，开展旨在争取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交流自由、信息自由和探索自由的教育，那么经过培养的教师应享有职业自由，并且应该认识到，失去责任感的自由极易沦为一张纸许可。

在将人权写进教育课程之前，实现另一项改革至关重要。教育曾被用作民族主义政策的工具，这种政策给人灌输的往往是民族或种族分裂主义和优越感。即便核心课程由人文学科构成，但由于人们过度关注外部架构，所以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丧失。

人权理想蕴含的共同目标，只能通过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案实现，并且，在制定教育课程和教学方案时，我们

《教育奖励》，由德国艺术家莎拉·哈特维希（Sarah Hartwig）设计，是非营利人权组织“为明日而生”于2014年组织的“受教育权”海报设计比赛评选的十佳海报作品之一。

必须认识到任何民族文化无不受益于所有种族和所有时代的人类文化遗产的遗泽，这种受益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愿意承认的程度。人权清单包含的各项自由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作为教育终极目标的人文主义，其真正的概念才能得以发展。这些自由和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培养学生掌握自由探究的方法。开展旨在争取各种自由的教育，要求我们严守纪律。套用卢梭（Rousseau）的话，人必须遵守纪律，才能享受本应属于自己的自由。

**圣捷尔吉·阿尔伯特**（1893-1986年）  
匈牙利生物化学家，1937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艾萨克·利昂·康德尔** 美国教育学家，比较教育领域的先驱，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进行过广泛研究。他出生于罗马尼亚，父母是英国人。著书40余部，发表文章300余篇。担任多种学术期刊编辑，任教于母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 个人权利和

# 文化共存

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

如何在尊重不同人类群体的文化情绪之时，使个体权利相谐并举？对于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 1895—1963年）而言，这是制定世界人权宣言所面临的主要难题。在这篇题为“人权声明”的节选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个两难困境。此文是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答复，于1947年发出。

探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制定《人权宣言》时面临的问题，必须从两种观点出发。第一种观点是构想宣言时的基本依据，它关乎尊重个体人格及其作为社会一员实现最充分发展的权利。然而，在世界秩序中，尊重不同人类群体的文化同样重要。

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群体由个体组成，而人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脱离社会则无法正常行事，这是自明之理。因此，问题在于制定一项人权声明，该声明不仅应当在言辞上宣称尊重作为个体的个人，它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群体的成员——个人，他们受到约束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因此，社会群体的命运与个人命运纠缠在一起，无法挣脱。



《荆棘之路》(2014年)，由塞内加尔艺术家巴克那多·博库姆(Barkinado Bocoum)设计。

由于在现代世界中，众多社会间联系密切，又因为它们的生活方式多种多样，所以《人权宣言》制定者面临的首要任务，就其本质而言，是解决以下问题：宣言如何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而不是一项仅根据西欧国家和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构思的权利声明？





“所有国家共同遵循的权利法案不能仅以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观为基础。如果要顾及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愿望和理想，这个权利法案必须至少立足于为每个民族所接纳的某些制度和社会学理论。”

F·S·C·诺斯洛普 (1893—1992年)  
美国哲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 人权瓦解

在过去 50 年，世界各地人类学家的研究广泛记录了人们解决生存、社会生活、群体生活的政治管制、与宇宙实现和谐共存并满足其审美驱动问题的多种方式。

所有民族都实现了这些目的。但是，没有任何两个民族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做法，某些民族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甚至常常大相径庭。

这就出现了一个困境。由于学习过程的社会背景，个人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最为可取。相反，除了他认为可取的源自文化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外，他在总体上也同样认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与自己的方式有所差异的其他方式，与他所熟悉的方式相比更不可取。价值判断便由此产生，它们本身以既有信仰为依托。

这些价值判断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行动，取决于人们思想中的基本规约。大体而言，人们愿意容己容人，他们对异己群体的行为表现出某种宽容，特别是在生存领域互不冲突的情况下。然而，在西欧和美国历史上，经济扩张、军备管制及福音传教的宗教传统已将对文化差异的认识转化为行动号令。在价值观和目的领域强调绝对性的哲学体系，使这一点更为突显。自由的定义、人权性质及诸如此类概念的界定因此变得狭隘。

在对非欧洲民族建立控制权之处，其他界定方式遭到诋毁和压制。文化间相似性的内核一直被忽视。

这种观点引起的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灾难性的。“白人的负担”这一理论被用于实施经济剥削和对世上千百万人的事务掌控权的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美国的扩张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族群灭绝。西方世界认定这些民族的文化是低等文化，或认定他们的“原始心智”发育迟缓而理应由上等人对他们进行监护，从而以此由进行扩张，导致霸权之下民族的人格堕落和人权瓦解……

##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宣言

在 18 世纪，起草一份《人权宣言》所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类权利问题，而是人们在单一社会所立规约框架之内的权利问题。

即使在那时，如美国《独立宣言》或《权利法案》这样崇高的文件，在奴隶制被视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的国度，亦可由自身为奴隶主的人写成。“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其革命性在将其推广到法国蓄奴殖民地之时最为明显。

如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因为宣言必须在全世界适用。它必须接受和认可诸多不同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如果它与以前的这类文件处于同一层次，则很难令印度尼西亚人、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信服。20世纪的人权不能由任何单一文化的标准加以界定，或顺从任何单一民族的愿景。这样一份文件将挫伤而非实现众多人类的个性。

这些人，因其在生活中所秉持的价值观是狭隘的宣言未曾正视的，将不能自由地全面参与他们所了解的唯一正当合宜的生活方式，以及构成其特定社会文化的体制、规约和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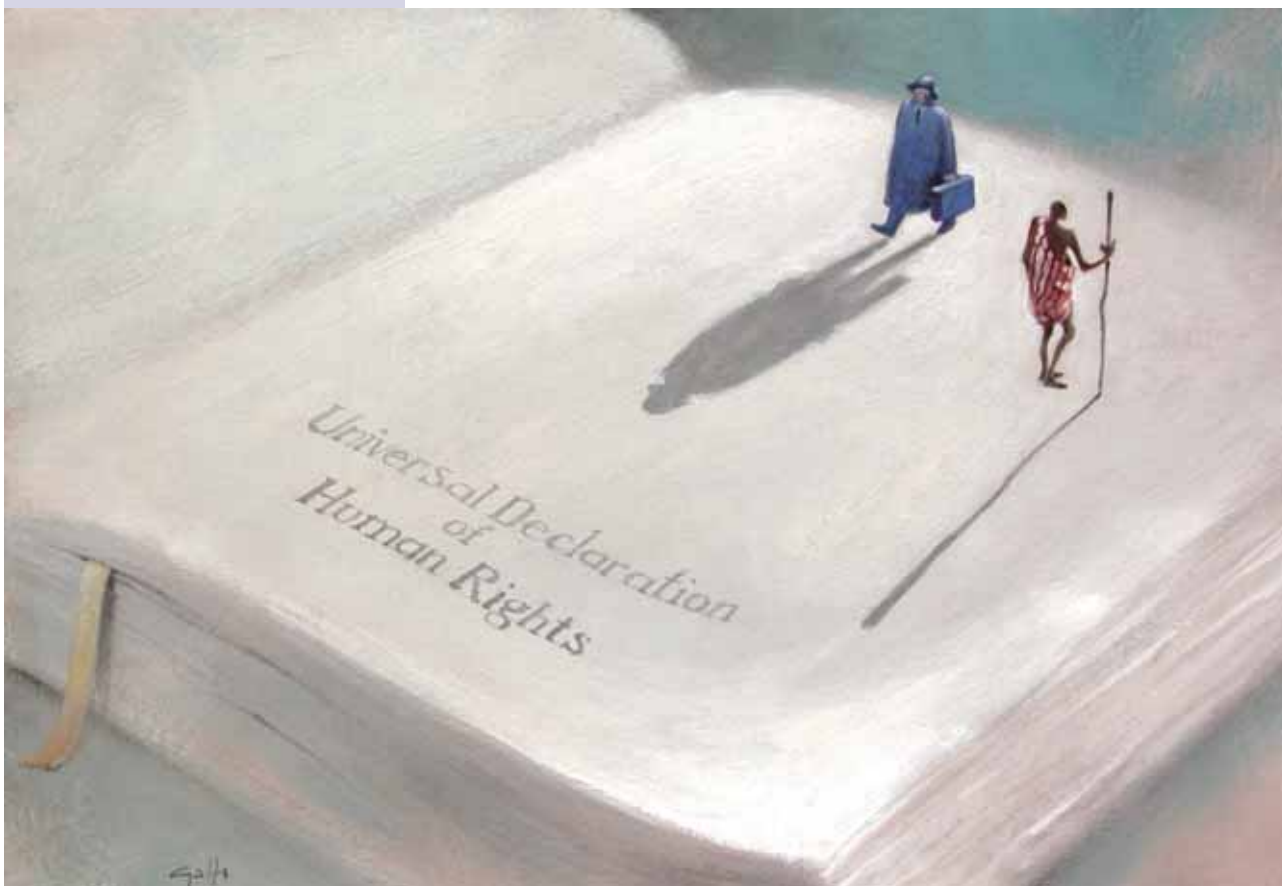
即便存在着否定公民的参政权或寻求征服弱小民族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也可能让这些国家的各个民族认识到政府行为的后果，从而迫使其停止歧视和征服，因为一个民族的政治制度只是其整体文化的一小部分。

人只有按照所在社会定义的自由来生活，才是自由的，其权利是作为社会一员所承认的那些权利。基于这一原则，自由和正义的普遍标准必定是基本标准。相反，除非社会各组成单位的成员个性得到自由发挥，并从不同个性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多样性中汲取力量，否则，有效的世界秩序无从产生。

在公布《大西洋宪章》的有限适用范围之前，全世界为之欢呼，证明在文化上千差万别的各民族，都理解并寻求自由。只有当按照自己的传统生活的人的权利声明被纳入拟议宣言，才能在现今关于“人”的科学认识的坚实基础上迈出下一步，从而界定彼此认定的人类群体的权利和义务。

**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美国）人类学家。因对文化的人文主义和相对性研究而闻名于世，并开辟了新世界黑奴研究这一新研究领域。他是非裔美国人文化和社会问题专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此受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的影响）和哈佛大学任教，还曾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于1951年在美国担任非洲研究首席负责人。

《世界人权宣言》，由意大利籍插画师兼画家亚历山大·加托（Alessandro Gatto）设计。



© Alessandro Gatto (alessandrogatto.com)



# 印度的

# 人类自由观



© photo Sebastiano Luciano / courtesy Fondazione MAXXI

## 什里克里希纳·文卡塔斯·帕塔姆贝卡

欧洲人权理论兴起之时，西方强调理性与科学。印度政治学者什里克里希纳·文卡塔斯·帕塔姆贝卡（Shrikrishna Venkatesh Puntambekar）对此提出批评，他认为：“我们必须放弃某些使人执着于现世的物质科学与有限理性的迷信，为人类引入更高的精神目标和价值。”他在“印度的人权观”一文中，阐述了印度人侧重于人的精神性的人权观念，此文是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答复，于1947年5月寄出。节选如下。

《人线流》，意大利罗马国立21世纪艺术博物馆（MAXXI）展出的一件装置艺术作品。路过的行人在印度画家N·S·哈沙（N.S. Harsha）的指引下围成了一个人线花环。

真正对人类的研究是研究具体的人。在一个给定的环境系统中，我们可以在人类身上找到某种高于其一般意识和行为的外在表现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构成了生活的理想和价值观。内在于人的还有一种更纯粹的精神存在，使之不满足于单纯的世俗追求。人的一般状况不是他的终极存在。他有一个更深沉的自我，称之为灵魂或精神。每一个存在都蕴含着一束光或灵性，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熄灭它，它仁慈而宽容，是人真正的核心。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它，保护它，确保它被用于为自身和人类造福。人的本性正是寻找生活中的真善美，对这些礼敬有加，孜孜以求。

我们必须指出，人的意志中还有不可预料的成分，人性中有无尽的复杂性。没有任何制度、秩序、法律能够满足伟大人格深处的潜在需求，无论它们是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抑或是教育的。人常常有巨大的潜能和创造力，不拘于旧准则和旧教条。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规训能够满足人类在心理、伦理或精神领域新表现出的发展可能性。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满足动态人格的成长需求。制度中总有某些不曾想到和不曾实现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实现的自由是人的自由。

## 自由助于成长

人类生活中总会出现新价值和新理想。没有一种现成的准则或制度能够满足伟大思想者和所有民族在所有阶段的需要和愿景。自由不可或缺是因为权威不具有创造性。自由为个性发展提供广阔天地，为它的成长创造条件。统一或遵从或含纳生活中的所有方面，都于事无补。当前所有权力的集权化、官僚制度和政党独裁、复杂性和标准化，没有为独立思想和发展、主动行动与选择留下多少空间。

既然我们的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观如此刻板、僵化、狂热、排他，我们能否注意到对国家自由和人类自由的呼声？由于在所有国家和大陆施行我们的规则和制度，我们有些人仍对邻里心怀优越感和憎恶感，仍对他们施以威压和统治。

因此，首先让我们“做人”，然后再规定人类自由的内容、特性和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尊重人性和个性，容忍我们的差异和团体内外行为的其他方式，然后联合起来，在灾难面前同舟共济，在宏伟事业上相互扶持。

毫无疑问，在印度谈论人权是非常必要和可取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文化和宗教政治情结占据上风，因此谈论人权几乎不大可能。当今世界没有人类，只有宗教人、种族人、等级人或团体人。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大众痴迷于人种特权、宗教、偏执和社会排斥。简而言之，我们参与了灭绝对立团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的阶级和社会所想的是镇压和征服，而不是共同联合和公民地位。

当前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各团体和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战争连绵不断，所有人道和容忍的概念，所有谦卑和尊重的观念，都已消失不见。偏执、不容忍和排他取而代之，坐在它们的王座之上。

当今世界陷入疯狂。它追求毁灭和专制、征服和秩序、劫掠和剥夺。对人类生活与成就的巨大憎恶让当今的世界政治不再有人道或仁爱意识。但是我们应当首先并永远宣布放弃“做人”吗？我们想要的是在生活中免于匮乏和战争，免于恐惧和挫折。我们还想要免于裹挟一切的国家、社会和宗教观，它们强迫个人遵从特定的、定向安排的生活方式。之后，我们想要思想和言论自由、运动和结社自由、教育自由，以及扩展精神和道德领域的自由。在任何确定和有序的生活规划中，我们都必须拥有非暴力抵抗和自治的权利，以制订我们对于美好人生的构想。

## 寻求更高精神价值

为此，我们必须放弃某些使人执着于现世的物质科学与有限理性的迷信，为人类引入更高的精神目标和价值。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我们不仅想要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还要美好生活的精神美德。经济技术统治论、政治官僚制和宗教癖好的需求，正在摧毁人的自由。

像摩奴和佛陀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强调了什么应当是人的必要保障，什么应当是人拥有的美德。可以说，他们提出了一部法典，规定了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十种基本的人类自由和节制或美德。它们不仅是基本的，而且其范围比任何其他现代思想家所提及的更为全面。他们强调五种自由或社会保障和五种个人自制或美德。

五种社会自由是：（1）免于暴力的自由；（2）免于匮乏的自由；（3）免于剥削的自由；（4）免于侵害或侮辱的自由；（5）免于天亡和疾病的自由。

五种个人自制或美德是：（1）没有不容忍；（2）同情或同感；（3）知识；（4）思想自由或良知；（5）免于恐惧和挫折或绝望的自由。

图片来自摄影作品集《赞美印度》，由希腊摄影师扬尼斯·帕帕尼科斯（Giannis Papanikos）拍摄。



© Giannis Papanikos (giannispapanikos.com)



“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个人精力和活动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意识的全面发展），他就必须与所有其他人保持适当关系，而不是将自己封闭起来（我们想象得出来那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完全‘独善其身’，只能自我修行并以他人之鉴自我反思。”

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1881—1955年）  
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古生物学家、法国哲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 更全面的自由

人类自由需要与之同等的人类美德或节制。考虑自由而不考虑与之相应的美德，将导致畸形的人生观和人格停滞甚至堕落，还会导致社会混乱与冲突。在有关人、社会和人类福祉的任何计划中，人类生活的两面性、自由和美德或节制、保障和自制，都应当得到理解与确立。仅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或追求幸福的权利还不够，仅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保障也不够，人类自由和美德必须更加明确和全面，才有助于人和人类身体、心理和精神发展。

为防止这种公开或潜在的相互灭绝战争——国内和国际战争——我们必须创造和培育一种新人或新公民，保证其获得或拥有属于人类生活和行为基本价值的这十种自由和美德。否则，我们的自由将无法实现其目标或使命，这个使命是指让人及其心理和道德文化免受临近灾难的影响，因为目前，整个人类文明都受到科学的致命武器以及强权专制国家的不人道的运作方式、意识形态和信条的威胁。

我们印度还想要免于外国统治和内战的自由。外国统治可恶至极。这片土地遭受外国统治已有数百年。我们必须谴责一切新旧形式的外国统治。我们必须在一个代议制的、负责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下，实现国家自治。然后，我们才能独立并生存下去。

我知道，执迷并受文化和宗教僵化思想支配的人，无法察觉国家或人类自由的呼声。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他们和他们的偏见而放弃更高尚的目标和愿望。

什里克里希纳·文卡塔斯·帕塔姆贝卡（印度）学者，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和那格浦尔大学任教，著有多部政治学和外交政策著述。



# 儒家的

# 人权之道

罗忠恕

中国传统中没有“权利”一词，但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伦理观念是履行对邻里的义务，而不是主张权利。相互义务被认为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中国哲学家罗忠恕（1903—1985年）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人权”一文中这样写道。此文是他于1947年6月1日寄出的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哲学基础调研的答复，节选如下。

在考虑一般原则之前，我要指出，过去中国思想家很少讨论人权问题，至少讨论的方式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从西方引入这个概念以前，无论是个人思想家还是政治宪章都没有公开提出过人权宣言。其实，西方政治哲学的早期译者发现，很难找到一个与英文术语“rights”对等的中文。我们现在把它翻译成“权利”，字面意为“权力和利益”。我认为，这个词最早是由一名研究西方公法的日本作家在1868年创造的，后来被中国作家采用。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人从不曾主张人权，或从不曾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事实上，人权思想在中国萌芽甚早，人民反抗统治者压迫的权利也很早便得到确立。

“革命”不是一个危险的用词，而是一个表达崇高理想的词汇。它常用来象征人民为推翻独夫所提出的正当诉求，人民的意志甚至被视为上天的旨意。中国古籍《尚书》写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统治者有义务照顾人民的利益，统治者爱人民即为遵从上天的旨意。所以这本书还写道：“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当统治者不再为人民谋福利时，人民便有权反抗他、推翻他。夏朝（公元前2205年—公元前1766年）最后一位统治者夏桀（公元前1818年—公元前1766年）残酷压迫百姓，堪称暴君，于是商汤发动革命，推翻夏朝。商汤认为，听从上天的召唤是自己的义务，即完全服从人民的意志，推翻暴君，建立新的朝代——商朝（公元前1766年—公元前1122年）。

商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商纣（公元前1154年—公元前1122年）也成了暴君，作恶多端，甚至比夏桀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武王领导革命（公元前1122年），处死商纣，建立周朝，延续800余年（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96年）。

旧王朝灭亡，新政权建立，朝代更替，周而复始，中国历史一遍遍重复着革命的权利。儒家思想代表人物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极力主张政府应为人民的意志而服务。他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联合国系列作品“千禧年巴别塔”（1999年），由中国艺术家谷文达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是“我们时代的神曲”项目的组成部分。

© Gu Wenda / Collection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Gift of Vicki and Kent Logan / CC BY-NC-ND 2.0 photo by Steve Rhodes





“任何一份人权宣言都不可能详尽无遗。它必须永远与历史特定阶段的道德意识和文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即使人类在 18 世纪末取得了通过第一份关于人权的书面声明这项重大胜利，我们也应当随着时代更迭不断修订这些宣言，这始终是人类的首要利益。”

雅克·马利坦（1882—1973年）  
法国哲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 相互义务

中国社会政治关系的基本伦理观念是履行对邻里的义务，而不是主张权利。相互义务被认为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孔子及其弟子描述的五种基本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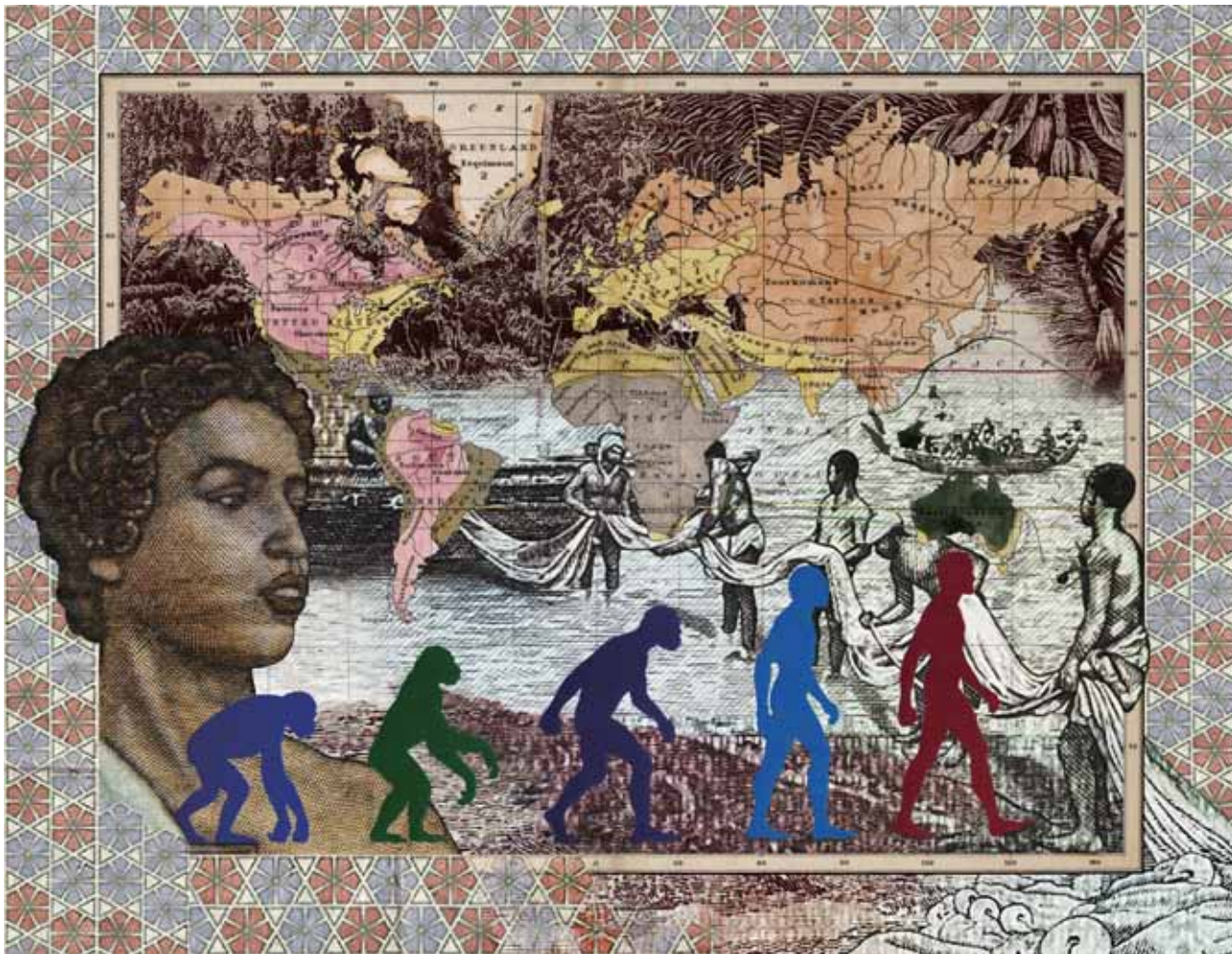
中国伦理思想强调的不是主张权利，而是同情心，认为所有同胞都有同样的愿望并因此享有同样的权利，如同自身所愿。通过履行相互义务，可以防止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道德格言。

过去，只有统治阶级或者有望成为统治阶级的人可以接受传统教育，没有人教导广大民众去主张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或者有望成为统治阶级的人时常受到把人民利益当作政府首要责任的教导。君主和官员们受到的教育是自己当作人民的父母或监护人，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自己的子民。真正的政治实践并非总是如此，但这至少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一学说的缺点在于，人民的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的良善，而统治阶级往往不履行职责，对人民肆意盘剥。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革命的原因所在。然而，中国处理人权问题的方法与 17、18 世纪西方思想家发展起来的人权理论截然不同，两相比较，着实耐人寻味。

罗忠恕（1903—1985 年）中国学者，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哲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



# 被殖民者的人权



© Malala Andrialavidrazana (www.andrialavidrazana.com)

## 伦纳德·约翰·巴恩斯

“人权的表述自然会反映出表述者遭遇的重大挫折……”英国反殖民主义作家和教育家伦纳德·约翰·巴恩斯 (Leonard John Barnes, 1895—1977 年) 这样写道:“当殖民地人民着手起草一项权利法案时, 他们的诉求通常与全世界受压迫者和无权势者的诉求一致, 但其特别关注点也会与殖民地无权势者的特性桴鼓相应。这也许在意料之中。”他的题为“独立民族的权利”的文章于 1947 年 6 月从伦敦寄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节选如下。

《强势种族》, 马达加斯加裔法国艺术家马拉拉·安吉利亚维祖扎拿 (Malala Andrialavidrazana) 创作, 她利用殖民时代生产的地图集、邮票、钞票和其他素材创造性呈现当今世界。

一块领土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 必然在政治上无权无势; 在政治上无权无势可能使公民自由受到严厉限制, “煽动叛乱”一词的法律含义也会超乎寻常地扩大 (当宗主国当局认为当地文化落后或低劣, 限制就会严厉到极致); 官方对煽动叛乱和聚众犯罪的担忧将导致司法机关和警察采取某些做法, 而这些做法在宗主国将被视为异常严酷之举。以上种种就是殖民地的总体状况。





这样的后果是全体从属民族，特别是他们当中更有教养和受过更美好教育的代表，明显表现出因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沮丧和堕落。因此，我们不应该忘记：绝对权力必然腐化的说法虽然很有道理，但绝对无权的负面心理影响也不容小觑。

人权的表述自然会反映出表述者遭遇的重大挫折。一项宣告出来的权利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愿景，而是“可行的构想和有效的工具”，它能表达出心怀怨愤的群体和穷人对于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被奴役者渴望自由，被歧视者渴望平等，被排斥者渴望博爱；被同胞利用而未获得尊重者渴望进步和人道；劳动者渴望充分就业，不理想的工作或是失业都会使他们感到心灵萎靡不振，能力得不到施展；当特权阶层和有权势者力图让自己在这个世上处于安全的境地时，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会渴望社会规划。这就是为何人权宣言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助力，至少在首次颁布时是这样。因为社会进步意味着对无权势者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

因此，当殖民地人民着手起草一项权利法案时，他们的诉求通常与全世界被压迫者和无权势者的诉求一致，但其特别关注点也会与殖民地无权势者的特性桴鼓相应。这也许在意料之中。其实，只要殖民地的不满情绪有了明确的宣泄形式，就表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公平经济的根本意义以及其政治从属的必然结果，就表明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些现象与殖民领地内普遍存在的剥夺公民自由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进一步讲，殖民地人民已经做好了拥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传统民主口号的准备，因为他们经常被用作达成他人目的的手段，他们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也因为这些口号很容易就能让宗主国当局陷于窘境。

所有不同的情绪和态度最后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色彩，他们穿着特殊的制服，显示出独特的殖民经历。这种色彩，这种制服，是在主张与宗主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是在表达对歧视的反对，因为在受歧视者看来，歧视既具有任意性也具有普遍性。

“人权是指所有人都能平等享有的权利。然而我们也认识到，人性的绝大部分是个人发展所处的特定文化的产物。因此，如果每个人都具备可以为制定普遍人权法案提供依据的一些共同特质，那么尽管存在文化差异，这些特质也必须具有共同的生理、心理或精神特点，或者必须具有可被视作世界文化的众多文化的一些共同特点。”

昆西·赖特（1890—1970年）

美国政治学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研，1947—1948年

就这一点看，殖民地民族的进步运动往往采用民族主义和解放主义的形式。这些运动具有解放主义特色，因为它们觉醒的政治意识将那些与宗主国的既定宪政联系视为外国统治的象征。它们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因为国家地位的独立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掌控，而没有可供支配的国家权力，解放主义者既不能断绝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宗主国的依赖，也不能在其断绝依赖关系后掌握宗主国的行政功能。

因此，我们既应把殖民地民族看成是因遭受特定形式的权利剥夺而备受压制与迫害的个人集合体，也应当把他们看成是在主权和国际承认问题上与所谓的独立国家争取获得平等地位的新兴民族。我们强调，这种诉求在于正式获得平等地位。它不是功能的实质平等，也不一定是古典意义上的充分行使国家主权。

当外部力量对主权施加的限制束缚殖民地民族，而且使他们显得低人一等时，他们就会反对这些限制。倘若他们是为了有效的国际组织的利益而自行选择这样做，倘若他们确信大多数其他自由国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同样的限制，那么他们也可能完全接受这些限制。

这就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立场，这就是他们的需求或权利。制定法律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宪章也保证不了他们的权利。对特定群体或社群的诉求，人们常常试图赋予其不可更改的法律效力。但是，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永远约束后继者，所以到最后，这些尝试要么徒劳无益，要么画蛇添足。

**伦纳德·约翰·巴恩斯** 英国反殖民主义作家、记者和教育家。曾在英国殖民地部任职，担任驻南非记者，并亲身经历了南非的殖民统治。著有知名作品《苏维埃的光辉照耀殖民大地》，1944年出版。



## 人权的

# 神圣性和普遍性

阿诺德·勋伯格

1947年7月21日，奥地利裔美籍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年）将“人权”一文从洛杉矶寄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在文中写道：“不管异教徒再怎么否认，灵魂不朽在信众眼里始终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即便异教徒在今天是正确的，信徒心中那份信仰的力量终有一天会让灵魂不朽。……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权——哪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权概念不为人知，人权定义不够完善，只要我们矢志不渝地坚信人权的存在，它就一定会实现。”节选如下。

我们必须遗憾地承认，大多数人自认为有权利挑战他人的权利，甚至不惜为此一战。更遗憾的是，短期内我们看不到当前的世界局势有任何改善的希望。

然而，这样的困境不应压倒我们对于新世界的渴望，在这个世界里，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基本认知，无须特意言明。人类若想获得这种幸福，就必须要有越来越多的个体怀着满腔热情，为实现这个古老的理想而奋斗，直到它实现。唯有渴望的力量才能推动社会思想或社会舆情的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免于一切纷争。

我们绝不能放弃。

不管异教徒再怎么否认，灵魂不朽在信众眼里始终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即便异教徒在今天是正确的，信徒心中那份信仰的力量终有一天会让灵魂不朽。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权——哪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权概念不为人知，人权定义不够完善，只要我们矢志不渝地坚信人权的存在，它就一定会实现。

假如普通法、民法和人权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应仅限于：

- 即便在普通法尚未找到解决方案的领域，人权也要力求让权力和阻力达成平衡。
- 我们必须确立适用于所有民族和所有种族的最低限度的权利。

负责制定《人权宣言》的组织，显然应该是旨在推动普通法不断完善进步的“先锋”。

我们一边想给权利定界，一边又想保护各方面的利益，这就让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无论是质疑《创世记》的伽利略（Galileo），还是不允许任何人违背上帝教诲的教会，双方都需要得到平等的保护，也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

纯粹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应该暂停它们前进的步伐，以平衡相互竞争的多种利益。毫无疑问，

这是因为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强大的反对力量，其中涉及的利益要么不为人知，要么没能及时显现出来。但是，对权利的研究有更完善的工具可供使用，也有更多的要求必须满足。

这就要求我们保护荣誉。

大主教凭着自己的身份，打了莫扎特一记耳光，他从没想过自己有可能因此被写进音乐史。

当时有谁能想到，艺术家的荣誉感有朝一日会如此重要？又有谁能预见到，某某艺术家在被卑劣的思想惊得目瞪口呆之后，会变得如此愤世嫉俗？

但另一方面，同样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评论家对瓦格纳（Wagner）、易卜生（Ibsen）、斯特林堡（Strindberg）、马勒（Mahler）等人造成的伤害，最终将被视为荣誉的标志。没有这样的敌人，就无法成就真正的伟大。

人权无法保证人们从不公正的行为中幸免，这是肯定的，但要到什么时候，人权的概念才能深入人心，让那些施暴者明白，给人造成这种痛苦是一种耻辱？

可悲的是，人权与民主一样有其弱点，在遭到攻击和破坏时难以为自己辩护。以维护人权为名义开展的所有行动，实际上都会损害作恶者那一方的人权，正如任何倾向于巩固民主的做法其实都是不民主的。

这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劝导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如此看来，我们似乎应该缩减人权涉及到的权利主张，让这个概念的实现不至于过分困难。



大多数信仰都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有时甚至表现得好斗、挑衅、咄咄逼人。对它们而言，容忍其他形式的信仰无异于自杀。

人有义务只相信真理吗？相信谎言的权利是否也值得保护呢？

《十诫》无疑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人权宣言之一。这些戒律保障生命权和财产权，保护婚姻、誓约和劳动成果，但由于基督教是一神教，《十诫》规定人们不能拥有信仰自由。

斯特林堡问自己：“假如不痛恨邪恶，我该如何真正去热爱善良？”人类之所以希望、甚至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对抗邪恶，就是因为这份对邪恶的痛恨。

正因为如此，某些人认为必须抨击“资产阶级”艺术，其他人则批评巴勒斯坦风格，首当其冲的就是伟大的建筑家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因为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异族的。

战士同时具备战胜敌人和压迫被征服者的意志和责任。

但对那些坚持战败方艺术形式和思想的人来说，他们的人权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出生的权利属于人权吗？控制生育的权利也属于人权吗？在人口过多时，人们是否有权让一部分人饿死呢？

宗教打算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严峻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变成悲观主义者。

《看得见/看不见》（2015年）系列作品中的一张照片，摄影者为法国摄影师弗乐阿俄·苏汉（Flore-Aël Surun）。

© Flore-Aël Surun / Tendance Floue

但我们绝不能放弃向往——赋予人权神圣性和普遍性。

渴望的力量和创造的激情在我们心中交织。

奥地利裔美籍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和创新精神的作曲家之一，全新无调性作曲方法的开创者。与许多犹太艺术家一样，勋伯格在 1933 年移民美国，于波士顿马利金音乐学院任教，1934 年移居加利福尼亚，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勋伯格曾在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重要教职，并在 1941 年成为美国公民。



## 人权和

# 文化视角

莱昂内尔·维尔, 安娜玛丽·德桑杰

目前, 一场关于《人权宣言》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的辩论正在展开, 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47年起提出的各项倡议再次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促进了关于多元文化视野的讨论。

今天, 《世界人权宣言》已经得到多数国家的广泛接受, 也是国际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便如此, 我们必须认识到, 国际环境自1948年《宣言》通过后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仅联合国大会的组成更加多元化, 国家也不再是唯一的政治行为体。它们现在必须和那些产生、重建或挑战现有规范性设想的超国家行为体、跨国行为体和地方行为体打交道。

而且, 国际人权法并不是唯一的规范秩序。除法律以外还有其他选择, 如习俗、宗教、社会和文化准则, 这些也可被援引以维护基本人权。

在许多非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 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与集体而不是与个人挂钩。和坚持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自由主义不同, 中国的儒家思想等更关注公共责任。而在非洲, 基于人道和友爱观念的乌班图哲学给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带来启发。

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后, 加卡卡法院参与全国各方的调解进程, 这是众所周知的另一个使用传统机制解决问题的实例。但还有很多其他例子。

### 群体途径

举例来说, 《曼登宪章》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之一, 尽管它只以口头形式代代相传。曼丁果帝国在中世纪占据了非洲西部大片区域, 于13世纪初颁布了《曼登宪章》, 《宪章》包括一篇“序言”和七个“章节”, 提倡以多样性为前提的社会和平、保障个人安全、教育、祖国的领土完整、食品安全、废除以掳掠奴隶为目的的远征以及言论和创业自由。这些原则, 决定了曼丁果族群成员的权利和责任, 在今天仍然有效, 并得到了马里地方和全国当局的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将该宪章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因为它是传统社会和法律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 不应被遗忘。

在非洲的另一端, 斯威士兰人民采用的一种群体途径也值得我们多加关注。在这个国家,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女性如果遭遇家庭暴力, 就只有一个维护自身权利的选择: 去警局报案并提交一份报告。但这样做往往适得其反: 因为如果丈夫被定罪, 就意味着负担全家生计的人锒铛入狱。这也是当地女性采取另一种策略的原因。

在节日庆典或庄重场合中, 妇女们一般一起表演歌曲, 而群体的其他成员, 包括男人, 应当保持沉默、仔细聆听。许多此类女性合唱团的表演都会持续数个小时, 其常备表演节目中包括谴责家庭暴力的歌曲。跨文化人权中心(该中心由中国、非洲和欧洲的学者于2014年在中国北京创立)开展的研究显示, 女性以这种方式公开对质男性比任何诉诸形式司法的手段都更有效。

印度也有一个非国家机制发挥效力并兼具社会合法性的例子, 即在农村地区设立妇女法院。这些法院只对印度《刑法典》有基本了解、但懂得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案件的妇女负责。尽管存在一些不足, 但对人们来说, 这些非正式法院是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们没有官方法院那样冗长且花费高昂的程序——它们接受地方支助和印度政府的供资。

从长远来看, 采用文化群体自身独创的途径可能比由外部力量或国家强制施行改变更具可持续性, 也更高效。对这些旨在保护族群的体系, 我们应该予以重视。

### 不同的思维形式

七十年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作出以下声明时, 正是在表达上述精神: “然而, 这样一份(人权)宣言不仅依靠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当局, 更依赖使宣言和信仰可行的共识。”



© posterfortomorrow 2018 - Sarah Hartwig

德国艺术家莎拉·哈特希维 (Sarah Hartwig) 设计的海报，是“为明日而生”组织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 70 周年于 2018 年组织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海报设计比赛的参赛作品之一。

这节选自《一项国际人权宣言的根据》报告（第 1 页），该报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集的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专家委员会于 1947 年 7 月 31 日提交。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一项关于人权哲学原则的全球调研，目的是在辩论中囊括各种传统和世界观的关键要素。

这份文件也坚定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念，即“对人权基础的重新审查越深入，可能出现的希望就越大”（第 3 页）。它还警示，与文化多样性相关的不同解读可能会成为阻碍，让我们无法就《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的权利达成一致意见并予以执行。

正如之前一份文件（1947 年 3 月 27 日的《人权备忘录》）所证实的（第 6 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其他地区已经兴起、正在兴起或注定要兴起其他人权理论。”

该备忘录援引法西斯主义作为理论上不可持续、实践中被完全推翻和打败的一种政治体系的典型代表，表明“将需要一份关于人权的全新构想，以体现像圣雄甘地这样的人的观点，或者相信冥想和神秘体验具有社会重要性及个人价值的众多印度思想家的观点。”

这份文件总结到，“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如今从非洲到中东、各种肤色的人们明显的思想动乱，注定会引发其他构想。”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力扩大文化视野，但它在制定《世界人权宣言》时并未考虑到亚洲或非洲的传统和哲学。即使文化差异被提上议程，最终盛行的仍是西方关于人权的理解。它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关注个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是社会和文化。而且，主张和落实这些权利的程序植根于西方法律文化，由国家和立法者发挥主导作用。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文化多样性、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和法律多样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进步，以便《世界人权宣言》的思想可以传播至地方群体，并在它们所处的环境和文化中发挥作用。

目前，关于人权标准缺乏非西方观点的辩论——这显示出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正为此感到不安——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47 年发起的讨论被过早地否定，而现在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莱昂内尔·维尔 (Lionel Veer)**  
资深外交官，荷兰人权大使（2010 年—2014 年期间任职），荷兰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和大使（2014 年 9 月—2018 年 9 月期间任职）。

**安娜玛丽·德桑杰 (Annemarie Dezentje)**  
人权和国际政治专业研究者，现为荷兰政府内政和王国关系部工作。



# 影像



1

1 2

以帮助 20 岁的吉赛尔（Giséle）驱除“邪恶之眼”为借口，她父母的一位朋友将她带到偏僻的地方，强奸了她。“我知道他以前就干过这事，”她说。被他糟蹋的那两个女孩一个 15 岁，另一个才 12 岁，她们的父母怕日后遭到报复，故而不采取任何措施。但吉赛尔决定伸张正义。



# 吉塞勒、玛丽、 维维亚娜 等百万女性

摄影：贝内迪克特·库尔津

文字：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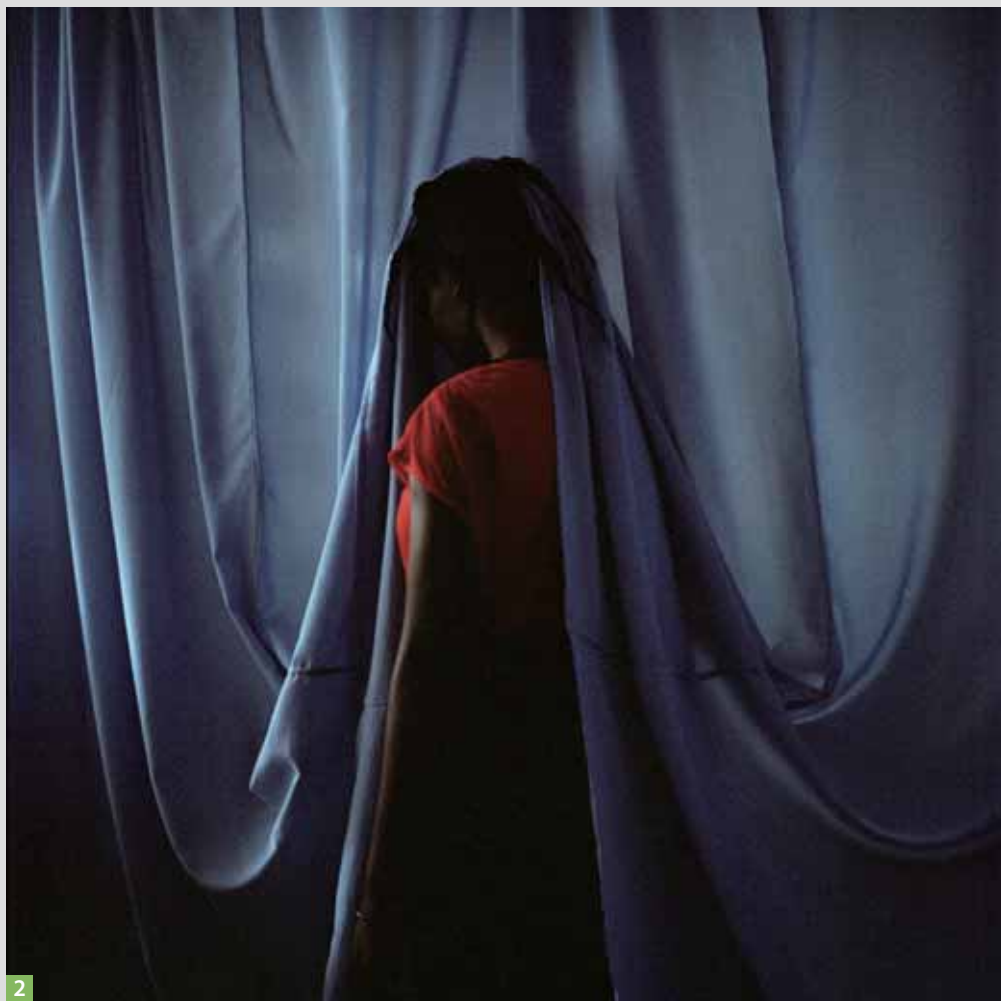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谨以此篇摄影报道纪念“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国际日”（11月25日）。

为了保护参加摄影项目的妇女，她们在文中使用的均是化名。

海地，2015年。在太子港的大街上，一名20岁的学生正在寻找工作。我们且叫她玛丽。一名年轻男子声称要帮助她。她描述道：“他要我陪他去他家里取一些文件。当我们到那的时候，他掏出了一把枪。然后就发生了那件事。”玛丽被强奸了。

不幸的是，这位年轻海地妇女的故事，只是更深重苦难的冰山一角。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没有国界之分。全世界的妇女不论其文化、宗教或社会经济身份如何，都在遭受这些行为带来的折磨和耻辱。

暴力行为是许多社会的禁忌，它迫使许多妇女对所遭受的苦难闭口不言，因此统计数据通常不能真实反映妇女的暴力遭遇。对这些妇女进行走访调查一般是了解该问题严重程度的唯一途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妇女在一生中会遭受身体暴力或性暴力。



2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正在努力发声，打破沉默。她们克服羞耻感和罪恶感，还有担心遭到报复的恐惧感。同其他四位女性一样（其中一名还未成年），玛丽选择加入这场斗争——她参加了“违其所愿”摄影项目。本项目于2016年由无国界医生组织与法国摄影家贝内迪克特·库尔津（Bénédicte Kurzen）共同发起。

“我们开车离开太子港，一起去苏尔斯扎布斯吧。我想穿着传统服饰在水里拍照，装作我在洗衣服一样。”

玛丽为她的拍摄选择了一个象征“净化”的场景。她想要恢复往日的活力，想要从那场可怕的经历中走出来，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她郑重地说道：“我要继续向前看，我要成为一名记者。”

“我不可能只通过她们的悲惨经历来了解她们，因为她们都曾设法抗争过，”库尔津解释道，“这为摄影提供了新的叙事视角。”

在海地，强奸直到 2005 年才被认定为犯罪（在那之前都被认定为猥亵）。在 15 至 49 岁的海地女性中，有 28% 的人报告称遭受过某种形式的身体暴力，有超过 10% 的人称曾遭受过性暴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2010 年海地首都发生大地震之后，该城市临时营地发生的性侵案件数量比该国其他地区多出 20 倍。无国界医生组织已经指出，海地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受害者的治疗滞后，例如缺少提供医疗和心理救助的机构，以及几乎没有向受害者提供任何社会和法律保护。

该问题久被忽视，官方数据远远低估该问题的严重程度，人道主义组织在太子港开设“牵起我的手”（Pran Men'm，海地克里奥尔语）诊所，一年后又启动了摄影项目。两年后，这家诊所已为 1300 多名性侵受害者提供了治疗，她们当中绝大多数都不满 25 岁。更令人不安的是，53% 的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为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是解决性别暴力问题唯一的长远手段。每年约有 2.46 亿儿童遭受各种形式的性别暴力侵害，尽管这个数字触目惊心，但是接受全面的、常规的性教育（学习性行为认知、情感、生理和社会层面的知识）的儿童和青少年少之又少。然而，这种性教育的益处毋庸置疑——年轻人不仅可以学习如何避免各种形式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侵害，还可以学习如何预防、辨别这些侵害，以及在受到侵害时如何寻求帮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18 年出版了《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这份文件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编制。该纲要的主要受众是负责教育和卫生事务的官员及其他主管部门，目的是帮助他们开发和引进性教育的课程与资料。







5

3 4 5

在太子港的一个临时居住地，一名男子溜入了一个有裂口的帐篷。里面只有莎拉（Sarah）一个人，没有人保护她。这名13岁女孩的母亲说：“这个人我们认识，他也住在这一片儿。”现在，她不想让孩子做每个小女孩都喜欢做的事情——跳舞。她解释说：“我觉得她在跳舞时太容易被人盯上了。”





7

**6 7**

20岁的玛丽（Marie）讲述了她在枪口的胁迫下遭到强奸的经历，“我在街上碰到了这个人。然后我们开始聊天。我告诉他我正在找工作。他说他的一个朋友正在找像我这样的求职者，还说我必须跟他去他家里拿些文件。当我们到了那以后，他掏出了枪。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一切。”



8



10

10 位于距太子港 12 千米处的克罗瓦街道上张贴的一则美容沙龙广告。



9

8 9

22岁的女孩薇薇安（Viviane）遭到了性侵，施害者是她的男同学。他说想借给她一本书，并邀请她去他家做客。“我一再问他，他父亲是不是在家。他说在，可我们到了以后，家里空无一人。”强奸是有预谋的。



# 观点

发亮的心灯象征着于 2017 年横渡地中海的 171635 名难民。照片为法国摄影师帕特里克·威罗克 (Patrick Willocq) 设计的装置作品《充满希望的心》(3 米 x 3 米, 2017 年) 的局部。媒介: 比利牛斯山黑色板岩, 临时船舶由塑料瓶和心形红色霓虹灯构成。

© Patrick Willocq

# 教育之于移民：

## 不可剥夺的人权

丰斯·库曼斯

人们往往将受教育权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被剥夺了这项权利。教育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它可以保护所有移民的自由和尊严，在帮助移民充分融入社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受教育权是一项合法权益，但在当下却遭遇重重阻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谨以此“观点”栏目文章庆祝国际移徙者日（12月18日）。

《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写道，教育是保护人类尊严的基本工具。很显然，只有当人权难以实现时——例如，当人们被迫逃离武装冲突或迫害，或是希望通过移民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时——人们才会更加重视人权。移民身处异国他乡，他们的个人教育可能得不到保障。

对难民而言，接受教育是成为收留国一员的最佳途径。通过上学，正规的移民工及其子女可以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他们的精神和社会生活均因此得益。



一个小移民在抵达希腊萨摩斯岛之后等待登记（2016年）。

寻求庇护者在等待命运裁决的同时，需要学习基础语言课程，而那些无人陪伴的未成年寻求庇护者更是如此。对非正规无证移民而言，接受基础教育不仅可以提升他们的自尊，还能帮助他们过上稳定、规律的个人生活。根据这项权利，各国义务提供教育服务和财政资源，至少确保没有人被剥夺接受基本教育的资格。

在冲突频发的国家（例如黎巴嫩、约旦、希腊和土耳其）边境上，设有临时难民营，一些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居住其中。而他们的教育状况，则有些特殊。由于缺乏相关设施（校舍、合格教师、教材）和财政资源，他们的教育可能难以维系。

在这种情况下，该由谁来负责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呢？国际社会应为此负责，但要保护这些弱势群体，首先需要坚定的允诺和强烈的政治意愿。这通常需要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以满足难民群体的教育需求。难民署是负责处理难民事务的联合国机构，其难民营教育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部捐款。假如难民儿童得不到优质基础教育，世界可能会失去整整一代人。

## 法律保障的是……

国际人权法规定：人人享有受教育权，不得以民族背景、社会出身或其他情况为由给予歧视。这条无歧视原则适用于在一国领土内居住的所有学龄人，包括非本国国民，不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因此，非正规无证移民理应享有受教育权。由此产生了明确且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国家政策自由。禁止任何理由的歧视，因为这会威胁到权利的本质。人们应享有进入教育机构的平等权利，这应是受教育权的核心或基本内容。

这是由人权的普遍性决定的。关于保护受教育权的特殊措施，可以追溯到 1951 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公约》第 22 条规定：“缔约各国应给予难民凡本国国民在初等教育方面所享有的同样待遇。缔约各国应就初等教育以外的教育，特别是就学术研究机会的获得，外国学校证书、文凭和学位的承认，学费减免，以及奖学金发放方面，给予难民尽可能良好的待遇，无论如何，此项待遇不得低于一般外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所享有的待遇。”

《儿童权利公约》(1989 年) 第三条第一款就此作出补充：凡是可能影响到儿童的措施，“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对象”，其中包括为所有移民提供教育服务。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1990 年) 保障了移徙工人、其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与就业国的国民享有平等待遇。



© Geuer & Geuer Art (www.geuer-geuer-art.de)

《优质教育》，由德国艺术家里昂·勒文塔特（Leon Löwentraut）创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贫困儿童教育特使乌特-亨丽埃特·欧霍文（Ute-Henriette Ohoven）发起的“艺术推动全球目标”倡议（#Art4Global Goals initiative）的组成部分。

关于儿童教育问题，公约第 30 条规定：“移徙工人的每一名子女应照与有关国家国民同等的待遇享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不得以其父亲或母亲在就业国的逗留或就业方面有任何不正常情况为由或因为其本人的逗留属不正常的情况，而拒绝或限制其进入公立幼儿园或学校。”这份公约还没有得到缔约国的广泛批准，这无疑是由于公约规定了某些意义深远的义务。

在区域层面，《欧洲人权公约》(1950 年) 作出了明确、严格的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受教育权”（《第一议定书》第二条）。

根据欧洲联盟的法律，申请庇护的未成年人和难民可以接受与欧盟成员国的国民同等的教育。在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都应享有这项权利，包括非正规移民。不过，可以获得的教育类型仅限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

## ……当下的问题

要落实移民的受教育权，接收国政府面临着重重挑战和困境。

要维护公众利益，就不能让非正规移民通过教育途径在国内社会站稳脚跟，应将稀缺资源留给已经获得正式居留许可证的人。另外，鉴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今后还需要用到移民劳工。





另一方面，新移民通过参与与逐步融合（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社会成员，这是他们的合法权益。各国在决定如何分配财政资源时享有政策自由，但同时必须遵守本国作为人权条约的缔约国而自愿承担的人权义务。

例如，要维护公共利益，可能需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非正规移民离开本国，踏上前往欧洲的危险旅程。不过，这些移民一旦抵达欧洲，就必须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这并不是说，他们就应该和各国公民一样获得所有服务。例如，假如非正规移民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来，各国可以限制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这属于国家的合法权益。但是，绝不允许限制其接受初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教育机会——在所有情况下都必须保障受教育权。

从现实角度看，人们必须认识到，许多难民由于无法返回原籍国，会从此留下来，在此定居。为此，各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未雨绸缪，制定与文化契合的教育政策，协助移民进入和融入劳动力市场。

首先，需要考虑青年移民的教育需求，以及本国公民和非国民在接受教育服务方面的差别待遇，在二者之间求取平衡。建议在移民入境之后尽快为其提供语言指导。

要确保难民获得教育、住宿、社会援助、医疗服务和就业机会，这必然会给政府造成财政负担。欢迎移民到来的慷慨政策时常会引发部分公民的不理解、不安和愤怒，为此，政府应从其他预算优先事项、政治利益和各国的国际人权义务等方面来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并维护相关政策。

最后，务必要让各界普遍认识到，移民的受教育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而不仅仅是通过政策措施得以实现的目标。国家、地方和学校管理部门都必须认清这项基本权利，并采取相应行动。

**丰斯·库曼斯**（Fons Coomans，荷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与和平教席负责人，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国际和欧洲法律系主任，马斯特里赫特人权中心主任，荷兰人权研究网成员。

## 搭建桥梁，而不是筑起围墙

与以往相比，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这对教育产生了巨大影响，需要采用灵活的创新性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移徙、流离失所与教育：搭建桥梁而不是筑起围墙》的中心主题。该报告分析了九种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经测验可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并在最后为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决策者提供了一套建议。

在人们决定是否移民、移向何方时，教育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影响个人的逆抗力、态度、抱负、信念和归属感。然而，对许多移民而言，特别是对被迫迁移的人而言，即便教育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他们也未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因为他们往往面临诸多行政性或歧视性壁垒。

该年度报告阐述了移民收留国将移民和难民教育列为各项计划优先事项的理由。大多数移民很有天赋，学习热情饱满，许多人为了更上一层楼，克服了重重困难。增加移民群体获取优质教育的机会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

在移民问题上忽视教育就等于没有认识到教育在接纳多样性和促进包容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借助有效的教师培训和教学材料，优质教育可以使移民掌握融入不同文化和挑战个人定型观念的技能。优质教育可以搭建连接不同文化与分歧的必要桥梁，并开辟出一条道路，通往一个更富于凝聚力、更加公正的世界。

## 协助教师

# 援助难民



© UNHCR/Anthony Karumba

杰奎琳·斯特雷克

全球共有 5000 万儿童流离失所！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世界难民日发布的惊人数据。面对这些遭受创伤、学业中断的受害儿童，教师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尤其是因为很多教师本身资历尚浅，或者根本没有执教资格。各国的一些相关机构正加紧采取措施，争取协助教师发挥最大作用。

难民学校的教师常常日复一日地面对着世界上最艰难的课堂。一间教室里可能坐着很多学生，他们曾亲眼看到自己的家园被毁，亲人受创或被戕害；有些学生身体残疾，这要么是天生的，要么是国内暴力冲突的结果。他们以前可能是娃娃兵，或是性虐幸存者，或许他们的兄弟姐妹没能像他们一样幸运地逃到安全的地方。他们的教育可能已经中断了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久。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算，由于被迫流离失所，难民学生的教育中断时间平均至少为三到四年。帮助他们重返学校是教育体系，特别是教师，多年来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2016 年，受难民署照管的 1720 万难民当中，有 640 万学龄儿童和青年。

在肯尼亚卡库马的难民营里，超级大班授课是教师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每班 90 名或 100 名学生非常常见，个别班级容纳 200 名学生也不足为奇。但是，帮助就在眼前，由哥伦比亚大学引入的一个项目正在从难民中培养教师。

其中近 350 万人失学；近 290 万人虽然能够入学，但他们的教室拥挤、资源匮乏。单单为了满足全世界流离失所学生的需求，每年就至少需要增加 2 万名教师和 1.2 万间教室。

卡尔图·梅格莎·加多 (Chaltu Megesha Gedo) 的经历鼓舞人心。刚到肯尼亚北部的卡库马难民营当老师的时候，她被分配到一个小学一年级的班级。加多回忆说：“都是些 5 到 10 岁的孩子，我走进教室，一下子就呆住了——教室里挤着 250 个孩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环境的确不够理想，但这仍是难民儿童和青年改变命运的最佳机会。教师仍是最有可能促成这一转变的催化剂，但这也需要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条件，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支持。

难民学校的教师，他们本身可能就是难民。往往他们跟自己的学生一样，遭受过同样的创伤。因此，相关培训项目必须解决教师的心理需求，从而帮助他们变成合格的职业教师。

## 创新举措

一系列联合方案和新颖的教学方法已逐步施行，用以支持难民教师的培养工作，关注这些教师的福祉。

《危机背景下教师培训材料》(TICC)是一项机构间方案，旨在整合现有资源，形成单一的综合资源，鼓励合作伙伴在紧急情况下统一开展方案编制工作。由此形成的开源式教师培训材料涉及五个领域：教师的作用和福祉；保护儿童、福祉和包容；教学法；课程和规划；学科知识。各领域均侧重于培养不合格或资历不足的教师，让他们掌握必要技能。

《危机背景下教师培训材料》是培养基本技能和确定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一步，它的发展也强调了单独培训的无效性。这一认识促使一些创新方案得以启动，如“教师互助”计划、“无边界难民高等教育”(BHER)计划等。

## 全球导师

“教师互助”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和芬兰非政府组织——芬兰教会援助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和路德宗世界联盟共同发起的一项联合倡议，它将培训课程、同伴互助、移动辅导等方法结合起来，为教师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

培训以《危机背景下教师培训材料》为基础，同时开办两套培训课程——为期四天的短期培训和持续数月的长期培训。此外，教师们还分成

小组，并各自分配一名同龄教辅员，负责引导学习圈和巡视课堂，以便为每一位教师提供协助。

移动辅导或许是这项方案中最具创新性的内容。通过瓦次普(WhatsApp)和脸书上的私聊群，教师们将得以分配到一名“全球导师”。这些交流活动有助于教师融入从业者这一更大的大家庭之中，并在其中与同行分享经验，获得教学建议。

## 跨文化交流

“无边界难民高等教育”计划为居住在达达阿布难民营(位于肯尼亚境内，靠近索马里边境)及周边地区的难民和当地教师提供一次机会，让他们得以获得肯尼亚和加拿大高校学府颁发认可的教师文凭及学位。这项独特的联合计划采用复合学习方法，汇集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约克大学、肯尼亚肯雅塔大学和莫伊大学，在开展在线学习的同时，大学教授还会在学校假期和节假日期间来到达达阿布难民营，提供面对面指导。

这项计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可以推动跨文化交流。例如，一些课程会安排达达阿布的难民学生与来自泰国湄索或加拿大多伦多的学生一起参加网络研讨会。通过这些跨文化交流，师生们均可以对当地的教学规范提出质疑，并从其他环境中寻得新的视角和观点。

但是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开展，以确保与难民相处的所有教师都能够接受培训，而这些方案提供了重要实例，让人们看到一些支持教师的有效而新颖的做法，哪怕有些教师在全球最偏远的角落。

**杰奎琳·斯特雷克**(Jacqueline Strecker, 加拿大) 难民署复原力和解决办法部教育干事，2012年以来一直在难民署任职，在为难民办学方面经验丰富。

## 在危难之中办教育

对于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来说，冲突、自然灾害和疾病爆发等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有时会导导致学业中断。全球教育伙伴关系(2016年)指出，六分之一的学龄儿童所在的国家正在经历冲突和旷日持久的危机。为在艰难时刻保护受教育权这项人权(往往可以挽救生命)，国际应急教育网(INEE)致力于为受到危机影响的儿童提供高质量、有意义和安全的教育。

国际应急教育网的成员遍布全球190个国家，包含1.4万多名个人成员和130个伙伴组织，其中不乏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的从业者、政府官员、捐助者、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員，其中许多人来自受影响地区，自愿参与应急教育的相关工作。该网络制定了战略规划来引导优先事项和相关行动，通过开展社区建设、召开会议、管理知识、扩大和宣传、促进和学习等方式提供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3年设立的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在推动国际应急教育网的发展以及制定世界公认的国际应急教育网最低标准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紧急状况期间及其前后，以及在重建过程中，人们正在依据这些标准来统筹协调优质教育干预措施。

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是国际应急教育网教育和脆弱性问题工作组的创始成员，同时也是国际应急教育网教育“时不我待”宣传工作组的成员，该研究所确保按计划优先拨付资金，保障紧急情况下的教育工作。

# 借助移动技术，

## 缔造全新生活

克里斯托夫·皮默，  
范胡华 (UNESCO)

穆贾希德·阿基勒 (Moujahed Akil) 是一位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他的事例说明，彻底革新的移动学习实践，其最大驱动力源于社区内部，用以解决实际需求、保持发展态势、赋予成员权利并实现影响力最大化。

2012年9月，穆贾希德·阿基勒因担心被捕而逃离叙利亚，当时他在收容国土耳其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是无法与那里的人们交流。

“语言不通，寸步难行，我甚至都无法与人们讨论在土耳其开始一段新生活所需的最基本的物品，”他回忆道，“比如，我去政府大楼，那里没有人讲阿拉伯语，我们只能用手脚比划，弄明白彼此的意思。”后来，阿基勒有了一部手机，他开始使用翻译软件找到与他的处境有关的信息，填写他先前拍摄下来的表格。

阿基勒曾是一名主修计算机信息科学的学生，也曾是阿勒颇的一名信息技术自由职业者，他利用自己的编码技术，在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在土耳其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学会了土耳其语。他还学会为手机编程。在早期难民经历的启发下，他开始开发一种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帮助叙利亚人获得他们所需的与重新安置有关的所有实用、合法的信息，使他们在土耳其重建新生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生命线，利用技术支持难民教育》的封面。

© Edel Rodriguez

2014年1月，阿基勒与朋友创立了自己的公司——Namaa Solutions。公司设在土耳其加济安泰普，距叙利亚边境约25英里。这家新兴公司利用其技术和创业技能，开发数字和移动解决方案，用于解决其他叙利亚难民的需求。

### 解决需求是关键

创业本身就很难。“缺少资金和可持续模式是主要挑战。”阿基勒解释说，

不过，他补充道，“满足需求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想获得这种信息，现在他们动动手指就有了。”这家小公司迅速发展，聘用了25名员工，其应用程序下载量持续增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联合国难民机构）和土耳其政府在2018年披露的数据显示，土耳其收容了350万叙利亚难民，如此看来，公司的成长并不令人意外。

这些难民中约有 94% 生活在难民营外，多数在大城市里独自打拼。Namaa Solutions 公司的 Gherbtina（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我们的海外同胞”）应用程序帮助他们跨越障碍，获得医疗和教育等基础服务。这一应用程序提供数种工具，包括视频、法律、求职、风险提示和“问答”，提供从法律援助、银行开户到寻找居所、招聘信息等各类信息，甚至包括医生名录。阿基勒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利用它来帮助全世界所有难民。”

难民署 2018 年 6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流离失所者的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850 万人，其中有近 2540 万难民，其半数以上未满 18 岁。

“叙利亚难民中有很多学生，他们希望在土耳其学校和大学继续学业，因此教育是 Gherbtina 上最重要的类别。”这位 29 岁的创业者说。该应用程序提供能让叙利亚难民继续完成学业的学校和大学的信息，并列出入学要求和所需证明。第二受欢迎的类别是在融入过程中所需遵循的法律法规信息。其后最受欢迎的内容是“我的故事”平台，他们在这里分享个人经历和日常生活。

## 跨越藩篱

阿基勒感受到语言造成的巨大藩篱，他在这方面有切身体验。2016 年，他推出了应用程序“Tarjemly Live”（在阿拉伯语中意为“为我翻译”）。该应用程序收取少量费用（每分钟 1 土耳其里拉或 0.21 美元），在用户与真人译者之间建立联系。译者通常也是叙利亚难民，但拥有更好的土耳其语言技能。Namaa Solutions 还以这种方式为具备阿拉伯语言技能的土耳其人创造就业机会。运营第一年的在线使用统计数据显示，77 位自由译者通过电话或文字完成了 1.7 万分钟、共计 3.7 万字的翻译量。这段时间以来，为该应用程序开发的文本和视频条目超过 1500 条，其涵盖的话题丰富多样。



© Edel Rodriguez

古巴裔美籍艺术家埃德尔·罗德里格斯（Edel Rodriguez）创作的插画作品《移动学习解决个人难题》。

为完善应用程序，Gherbtina 还建立了网站及脸书主页。“脸书上的主页是应用程序的一个得力组成部分，使我们能够直接与用户互动。”阿基勒解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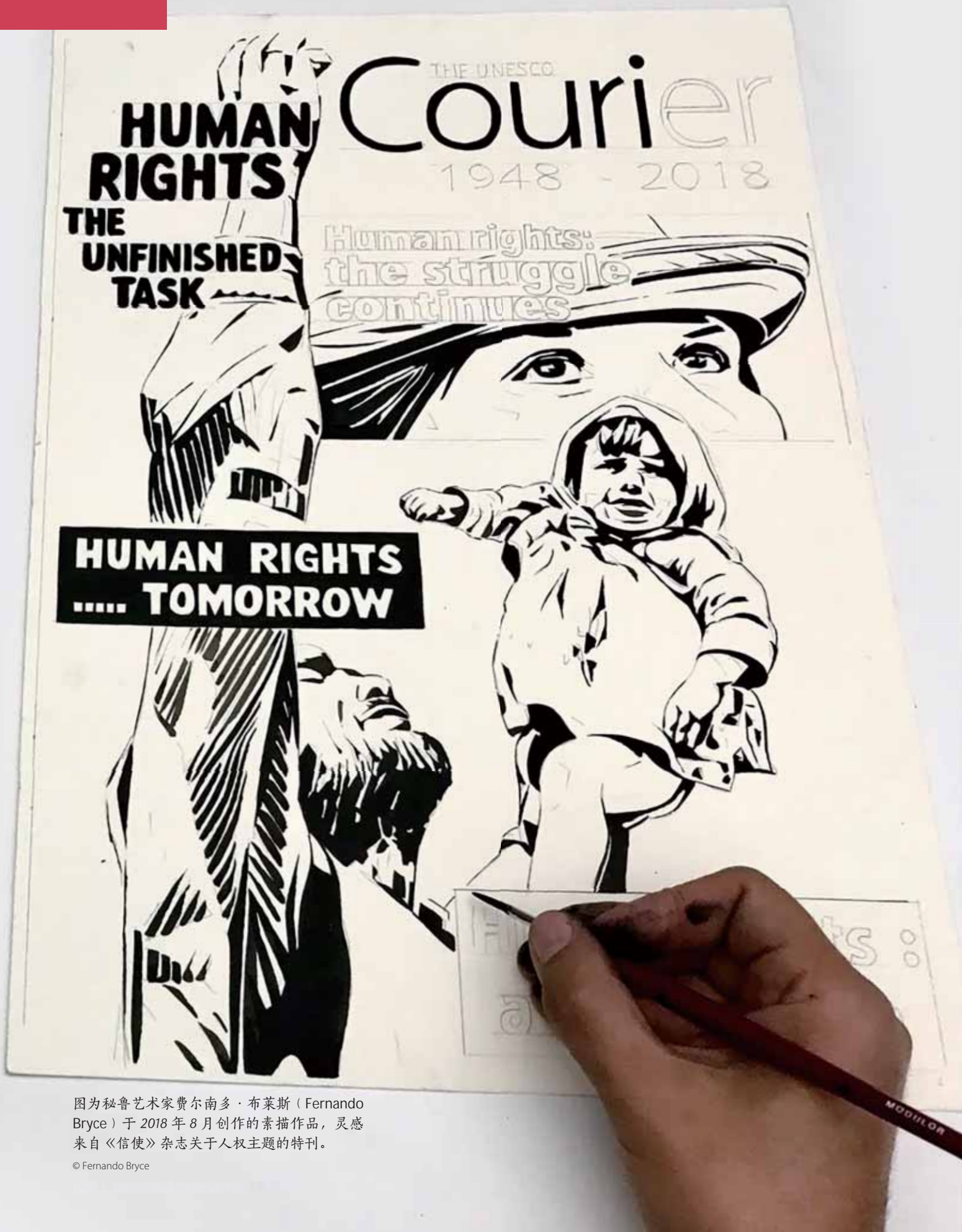
阿基勒的创新精神并未消退。规划中的新项目包括一个供叙利亚难民使用的学习管理系统和互动式学习内容。另一个项目是 buy4impact.com，这是一个交易平台，可以帮助叙利亚人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手工产品。

**克里斯托夫·皮默**（奥地利）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研究员、讲师，专攻教育背景下的数字化学习与知识管理，他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8 年出版物《学习生命线：利用技术支持难民教育》的合作作者。

**范胡华**（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化部门助理项目官员，协助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伟东集团信托基金项目——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实现“2030 年教育议程”。



# 嘉宾



图为秘鲁艺术家费尔南多·布莱斯（Fernando Bryce）于2018年8月创作的素描作品，灵感来自《信使》杂志关于人权主题的特刊。

© Fernando Bryce



# 费尔南多·布赖斯： 历史现在时

卡洛丽娜·罗兰·奥尔特加，露西亚·伊格莱西亚·昆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采访

秘鲁艺术家费尔南多·布赖斯（Fernando Bryce）称其工作过程为“模仿分析”。用墨水在纸上纤毫毕现地手绘他从杂志、政治宣传册、海报和旧报纸上撷取的文字和图像。利用这一技法，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现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时刻，例如古巴革命、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2015年，《信使》杂志成为一个绘画系列的灵感源泉，该系列定名为“需求之书”，本期《信使》杂志的赠刊专门登载该系列。我们来了解一下详情。



© UNESCO / Danica Bijelić

费尔南多·布赖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前（2018年6月）。

**您能否跟我们谈谈您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创作的作品？**

那是一个由81幅画作构成的系列，描绘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从1948年创刊到1954年所做的工作，这些画作全部基于《信使》的封面图片或文章。这个系列是我耗时多年的整个创作周期的一部分，含有对21世纪的图解和描绘。这些作品展示了某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进步和遇到的挫折，每个系列都有不同的构想，使用了不同的意象。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系列，使用了我找到的报道战事的档案资料——这次是电影海报和新闻头条。这个系列完成之后，我在2015年决定从一个在语言和

主题方面都更侧重于文化的视角，开展我的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我提供了联合国这个主题，该主题基于人权的基本理念和它的普世话语——在一切都有待建构之时的所有进步理念及其未来前景。

**系列作品的标题“需求之书”从何而来？**

《需求之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出版的一部作品，突出强调战后世界巨大的教育、科学和文化损失与需求。1948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就此撰文，我发现它极具象征意义，因此，我给自己的系列作品取了同样的标题。

**您如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获取素材？**

我在研究以往工作的过程中，收集了很多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我还获取了《信使》档案馆和柏林国立图书馆的数字资源。

不得不说，这份杂志非常精彩，是一份极好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每一个特殊时刻，真正做到以全新视角诠释进步理念。当时的种种信念与当今世界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

令我惊讶的是，在浏览1948年至1954年的各期《信使》杂志时，我发现当时困扰世界和人类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全然没有得到解决。虽然世界已历经沧海桑田，但是我们所关切的仍然是同样的问题。



“我所做的是一种再加工，将文件转化为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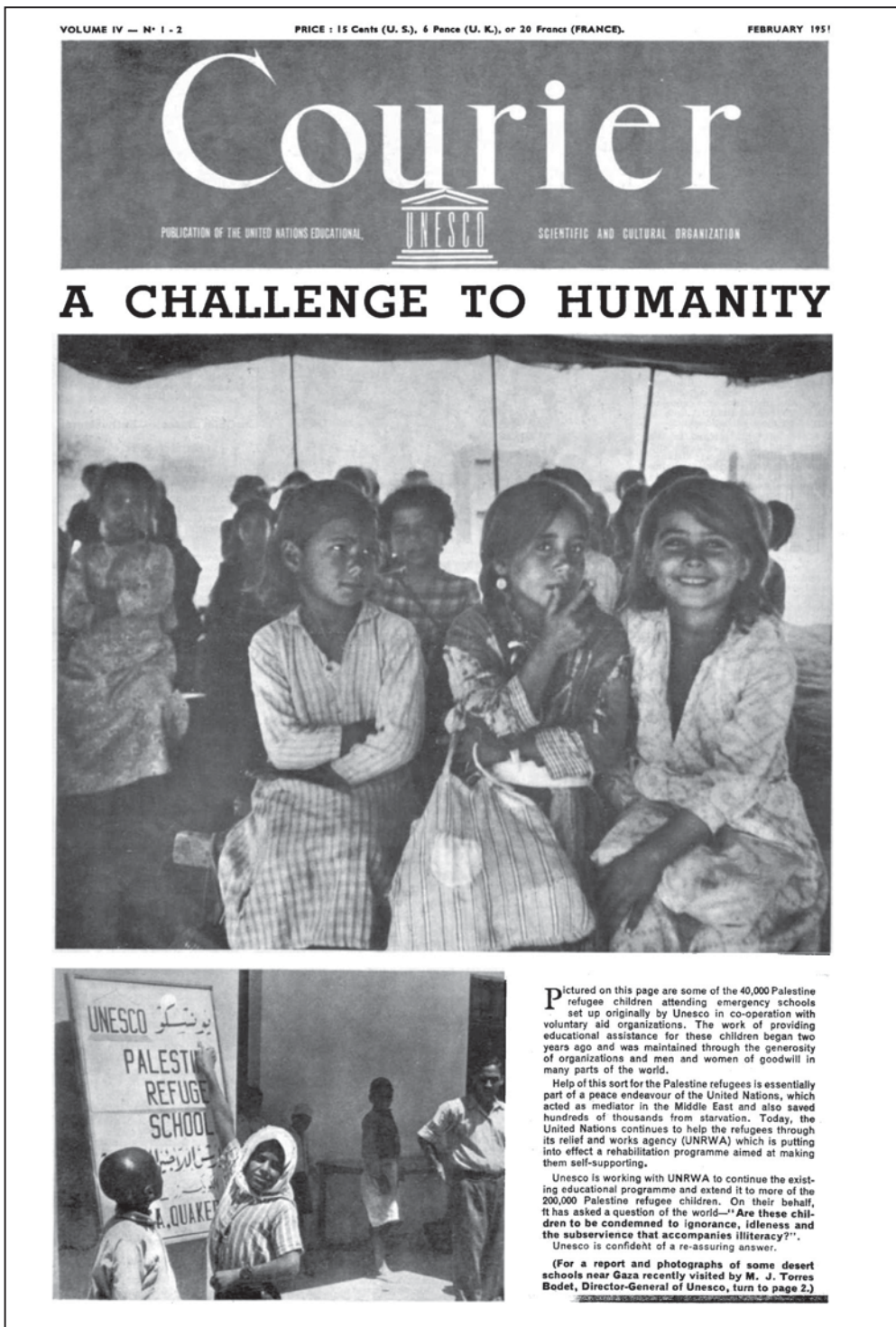
在您看来，这些备受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反人道主义倾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面临的真正政治挑战。世界观总是千差万别，呈现世界的方式五花八门，但是站在欧洲立场上对某种普世主义的过分批评，或者当前的多元文化危机，并不能撼动人权的根基和对人权的尊重。公正言之，人权是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信条——无论人权是否得到尊重。

正如您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创造作品，您总是利用历史资料和档案进行创作，将它们转化为艺术作品。您能否描述这一过程？

首先，历史总是引人入胜，历史事件和历史记载都是如此。档案是在当下整理出来的，历史也存在于这个当下。我的作品，意在拯救这一历史并使之常新。我通过绘画，将一个文献中的世界转化为一个全新的现实中的世界。在这个新环境中，可以从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创作，将文件看作图画。我所做的是一种再加工，将文件转化为艺术品。

除了从《信使》杂志中汲取灵感创作系列作品，我还利用 20 世纪初创立的美国视觉艺术杂志《艺术新闻》、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的拉丁美洲艺术杂志《新艺术》，以及其他杂志和出版物进行创作。



《信使》杂志 1951 年 2 月期封面，及费尔南多·布莱斯据此于 2015 年创作的艺术插画。

2018 年 5 月和 6 月，我在德国柏林展出了“自由为先”系列作品，这个系列作品受到文化自由大会出版物的启发，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 1950 年成立于柏林的协会，致力于反对独裁政权。该系列作品是对冷战开端的一次回眸。

您何时有了从档案中汲取灵感的想法？

20 年前，我移居柏林。当时这个城市正处于一个异常重要的过渡期，我在这个地方深受启发——这里曾有过对记忆概念的大讨论。在这些历史时刻，档案的概念才具有它完整的意义。





# Courier

FEBRUARY 1951

PUBLIC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 A CHALLENGE TO HUMANITY



**P**ictured on this page are some of the 40,000 Palestine refugee children attending emergency schools set up originally by Unesco in co-operation with voluntary aid organizations. The work of providing educational assistance for these children began two years ago and was motivated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organizations and men and women of goodwill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Help of this sort for the Palestine refugees is essentially part of a peace programme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acted as mediato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has sav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from starvation. Today, the United Nations continues to help the refugees through it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UNRWA) which is putting into effect a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aimed at making them self-supporting.

Unesco is working with UNRWA to continue the educational programme and extend it to more of the 700,000 Palestine refugee children. On their behalf, it has asked a question of the world: "Are their children to be condemned to ignorance, illiteracy and the subservience that accompanies illiteracy?" Unesco is confident of a reassuring answer.

(For a report and photographs of some desert schools, see *Courier* recently visited by M. J. Torres Bodet, Director General of Unesco, this, to page 2.)

© Fernando Bryce

此外，我那时对自己的艺术作品也并不满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我重拾书写的乐趣而又无须放弃绘画。这一发现，加上我对档案概念的理解和对真实档案馆的走访——在那里邂逅过去的时光，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激发了我的新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决定了我后来的作品。

**您为什么专门从《信使》杂志的 81 张内页和封面上选取图片，您想让人关注什么？**

我的工作永远是一个取舍过程。在这方面，我选取的图片在我看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最为相关，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发起的打击种族主义学说和反种族主义话语，例如从克劳德·列维-斯特劳（Claude Lévi-Strauss）的著述开始。我要在此提及的是民族和文化平等，以及人类的一体性。

我还找到了与非殖民化有关的旧资料，既有刚刚从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的资料，也有记录了所谓自由殖民主义垂死挣扎的资料，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自由殖民主义仍然相信它可以维系自己的帝国。当然，还有所谓“原始”民族问题。在这方面，克劳德·列维-斯特劳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指出这些民族并非落后，而是他们的思维复杂。大体而言，我感兴趣的是《信使》杂志所强调的科学进步和人类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巨大灾难发生之后，有人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您认为这种信念是否仍然存在？**

不，这种信念已荡然无存。我们发现自己走进了某个死胡同，必须另寻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乐观时期与我们今天的处境形成一种强烈反差。以我自己的这种方式赋予这类资料新的用途或许是我的工作使命。在艺术领域和必要的象征性层面上，反思与经验始终携手同行，我们艺术家或许无力改变很多，但我们希望能够指出可能的前景。

**费尔南多·布赖斯** 1965 年出生于秘鲁利马，在秘鲁天主教大学开始学习造型艺术，后移居法国，在巴黎第八大学和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继续深造。于 20 世纪 90 年代移居柏林，学习水墨画技法，并发现了柏林国立图书馆的报纸档案。他现在辗转居于利马、柏林和纽约，最近在纽约展出了他的《需求之书》作品集。该作品集于 2015 年完成，可在哈佛艺术博物馆、纽约亚历山大和博宁画廊的网站上在线观看。



# 时事

塔哈尼是图书拯救队的组织者之一，他们从伊拉克摩苏尔大学中央图书馆的灰烬中拯救了数百本书籍。照片由阿里·巴鲁迪 (Ali Al-Baroodi) 拍摄，他用相机记录了被“伊斯兰国”摧毁的摩苏尔城废墟中的日常生活。

© Ali Al-Baroodi



# 摩苏尔， 拥有两个春天的城市

伊纳姆·卡沙希

伊拉克小说家伊纳姆·卡沙希 (Inaam Kachachi) 为读者描绘了她钟爱的城市——朴素、欢愉、矛盾、受创、血流成河、奄奄一息的摩苏尔。她讲述了自己对尼尼微的深深眷恋，而这座古城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信使》杂志谨以此文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2018年2月提出的重振摩苏尔精神的倡议。通过保护和鉴赏文化遗产，这项倡议旨在参与伊拉克的社会和经济复兴工作，助力可持续发展，推动不同族群之间相互和解。

© Ali Al-Baroodi



在“伊斯兰国”制造的一场浩劫之后，摩苏尔大学中央图书馆的中心藏书区所剩无几。

几年前，在造访美国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阿拉伯笑话——一名男子被判处死刑，在套上绞索之前，人们问他还有什么遗愿，这个人回答说：“我想学日语。”我们这些摩苏尔人身处类似的尴尬境地，一边被迫流亡，一边梦想着无望的归程。

在这次访问期间，底特律的一家当地电台邀请我参加一档节目。这家电台由伊拉克人社区经营，在当地颇具影响力。我惊讶地发现，电台的所有节目都用迦勒底语播出，人们自然也就要求我说这种语言！我不得不对众人解释一番，我的父母虽然是基督徒，但他们是摩苏尔人，作为城里人，他们在家里说阿拉伯语。而迦勒底语

是阿拉米语（基督使用的语言）的现代变体，是城外基督教村庄居民使用的语言。

作为记者，我一直用阿拉伯语写作。我对迦勒底语略知一二，不过也仅限于仪式上吟唱的几句歌词和诗篇。我在巴格达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但摩苏尔是我的最爱，我想，它是我的精神家园。这座城市四周有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以前，我们常在复活节去摩苏尔度假，享受那里温和的气候，欣赏那点缀着红色虞美人与黄色洋甘菊的花园之美。我从小就知道，摩苏尔有两个春天——因为，这里的秋天宛如第二个春天。

我还知道，摩苏尔是一座保守的城市，摩苏尔人以认真、勤勉、严谨而闻名。在这里，感受不到丝毫的冷漠。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伊拉克音乐中极少能够听到摩苏尔口音。除了19世纪伟大的作曲家莫拉·奥斯曼·毛西利 (Molla Uthmān al-Mawsili) 和巴希尔家族之外，特别是穆尼尔·巴希尔 (Mounir Bachir, 1930—1997年)，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鲁特琴演奏家之一，大多数伊拉克歌手、作曲家和词曲作者都来自南方。这些艺人有着明显的乡村口音。如今，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一些摩苏尔歌曲，不过数量屈指可数。

# “摩苏尔既保守，又宽容。”

有一次，也许就因为我穿了一条短裙，一个小男孩朝我扔了石块。这难道就是摩苏尔人的保守天性吗？母亲为了迎接开斋节，特意为我缝制了这条红裙子，还配上了白色的彼得潘小圆领。我向一个过路人求助，那人却对我破口大骂：“小丫头，还不快遮住你的腿！”这个小丫头当时只有七岁，她的裙子覆在膝盖以上两厘米的地方。

摩苏尔既保守，又宽容。听我给你讲两个故事吧，从中你可以看出摩苏尔曾经是一座何等开明与包容的城市。当时，我父亲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感谢父亲对我的厚爱，是他鼓励我钟情于阿拉伯语、阿拉伯诗歌和文学）。

## 关于《古兰经》的故事二则

上高中的时候，父亲的阿拉伯语是全校最好的。按照惯例，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得到一本精装版《古兰经》。就在颁奖典礼的前几天，父亲走出校门时看到校长正坐在马车上（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常见的交通工具），在校门口等着他。校长示意我父亲坐到他身边来，然后便一起去了城里的一家大书店。校长说：“你可以选择任何一本书作为奖品，无论价格高低。”对于一名基督徒学生来说，这其中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了。但父亲拒绝了这个提议。校长又劝他说：“阿卜杜勒·阿哈德（Abdel-Ahad），你是一名基督徒，而摩苏尔是座保守的城市。我们不能把《古兰经》交到非穆斯林学生的手上。”



© Ali Al-Baroodi

击溃“伊斯兰国”之后，音乐演奏在摩苏尔城不再受到限制。哈利德（Khalid）是第一位在摩苏尔城街头公开演奏的艺术家，这座城市正在从灰烬中重生。

我父亲不肯让步，表示绝不接受任何其他奖品。最终校长还是屈服了，他要我父亲保证，会像穆斯林家庭一样尊重这本《古兰经》。20 世纪 60 年代，我的姐姐又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结果却大不相同。

姐姐是巴格达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她在《古兰经》释读课上拿到了最高分。系主任把姐姐叫去谈话，要求她放弃奖品，以免出现尴尬局面——他怎么能宣布一个基督徒学生这门课的成绩优于其他穆斯林同学呢？这名老师显然不具备 30 年前摩苏尔高中校长那样的勇气。



1948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迫使数以万计的犹太人离开了摩苏尔（即便在今天，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依然保留着极为明显的摩苏尔口音）。

伴随着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伊拉克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之间的争夺导致各地血流成河，摩苏尔也未能幸免。后来爆发了海湾战争，美国人占领了伊拉克，举国上下一片混乱。但最糟糕的还在后面——“伊黎伊斯兰国”占领了摩苏尔，随后，大批基督徒流亡他乡，遭到放逐。全世界眼睁睁地看着见证过近七千年文明的博物馆、古代雕塑和文物古迹被摧毁，却爱莫能助。

2017年6月，在电视上看到努里大清真寺的标志性宣礼塔（“驼子”）被炸毁时，我不禁泪流满面。这座宣礼塔像比萨斜塔一样是倾斜的，它是摩苏尔的象征——人们把它印在明信片上，就像埃菲尔铁塔、自由女神像和埃及金字塔一样。我还记得，当年美国战机炸毁了巴格达市最美丽的悬索桥，我的前任教授、女诗人拉米阿·阿巴斯·阿玛拉（Lamiãa Abbas Amara）在那一天用阿拉伯语方言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断了的是桥梁，是我的肋骨。”这正是我看到摩苏尔的“驼子”宣礼塔被摧毁时的感受。

最重要的是，比起石头，人更重要，但人们正四散流亡，被赶尽杀绝，他们是受害者。日复一日地，带着这份悲伤，我才渐渐意识到自己早已在小说《飘零》（2016年）中预见到了这一天。流亡仍在继续，大批基督徒正陆续离开伊拉克，特别是摩苏尔。

但如今，我在接受采访和写文章时，都会大声清楚地表明我的身份。不为维护社群，只为证明，伊拉克，这个我出生、学习、热爱、成家立业、喜得长子的国家，曾经有过一段光明之期，那时，从没有人想过要追问我的宗教信仰。

如今，我寄居巴黎，有幸与年逾八旬的摩苏尔作家萨菲娅（Safiya）一起追忆在伊拉克度过的那些时光。萨菲娅和我一样，也是移民。她向我讲述了上个世纪她在摩苏尔的精彩人生。萨菲娅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伊玛目，但她和城里的朋友们一样，身穿巴黎新款时装，有着活跃的社交生活和充实的精神生活。而今天有谁能够想象出这样一幅场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医学院招收女生就读，女学生们身穿白色短裤，与男同学一起打网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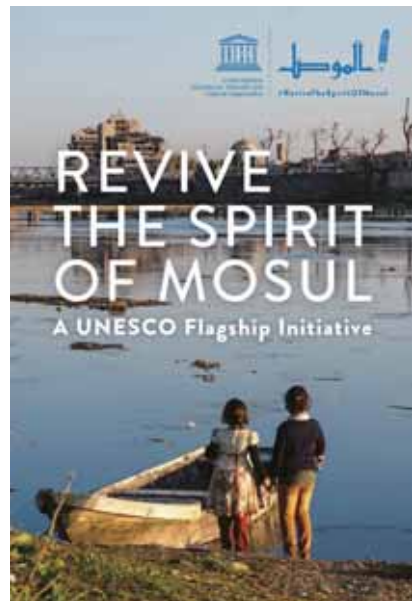
**伊纳姆·卡沙希**（伊拉克） 小说家、记者，1979年进入索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在法国定居。著有多部小说，其中包括：《飘零》（*Dispersés*, 2013年），其法文版获得由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和拉加代尔基金会颁发的2016年阿拉伯文学奖；《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Si Je T'Oublie, Bagdad*, 2003年），该作品于2009年被译成法语；《伊拉克女性的抒情诗：伊拉克女性剧作集》（*Paroles d'Irakiennes: le Drame Irakien Écrit par des Femme*, 以法文出版，2003年）。

## “断了的是我的肋骨……”

摩苏尔在丝绸之路上，我很自豪地告诉我的法国邻居，平纹细布（一种精细棉布）就源自我的家乡。在摩苏尔，来自亚美尼亚、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的，信仰三大一神教，分属多个不同种族的孩子们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和睦相处。但随后，政治纷争开始荼毒这座城市。

## 穿白色短裤的女孩

60多年来，我始终以伊拉克人自居，拒绝被称为基督徒，拒绝将自己囿于某个单一群体之中。当我的书被译成法语时，记者问我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我嘲笑他们的幼稚，并且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 阿尔弗雷多·孔蒂：

# 遗产出租：

## 两全其美？

弗雷德里克·瓦舍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采访

《世界遗产名录》上有几处备受瞩目的遗址现在可供富人租用，用于举行婚礼或聚会。但是，这会不会污损这些在文化上弥足珍贵的场所？答案是“不会”，遗产保护专家阿尔弗雷多·孔蒂（Alfredo Conti）解释道。根据这位阿根廷建筑师的看法，这种方式甚至可以促使更多人对文化产生兴趣。

某些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历史遗迹目前可供租用，用于举办私人活动。这种做法能否接受？

遗址最初的用途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或改变，那么如何利用它们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火车站改造成了博物馆，修道院和具有历史意义的房舍改造成了旅馆。

文化遗产建筑蕴含历史和文化价值。承载这些价值的特质可能是有形的，例如建筑物的设计、形状或建筑材料；也可能是无形的，例如在时间长河中的不同用途，甚至是与之相关的传统。目前，利用这些财产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它们的新功能应当与其特质及价值的保护相适应。



© Observatorio UNESCO Villa Ocampo

曾几何时，遗产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那些从历史或艺术角度看最具意义的遗址，尤为如此——必须将它们“冻结”在往昔的某个时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它们变成博物馆。

但并不是每一个历史建筑都能变成博物馆，因为遗产保护耗资不菲。多数情况下，保护、维护和修缮资金来自政府。收取入场费、出售纪念品和书籍，或提供餐饮服务，这些都是收入来源。但一般这些收入不敷所需。政府机构常常没有太多预算。

因此世界各地都呈现出这种新趋势：开放遗址和纪念性建筑供私人活动使用。当然都附有活动类型、开放区间、宾客人数和时间等限制。

这里有几个国际实例。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意大利建筑——那不勒斯北部的卡塞塔王宫，同样受教科文组织保护、位于维也纳的美泉宫和美泉宫，巴黎的罗丹美术馆和维克多·雨果故居，现在都可用于举行婚礼。甚至连具有象征意义的法国世界遗产凡尔赛宫，也可租用于特定类型的活动。



“遗址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它可以产生收入，而这种收入又应当用于推动遗址的保护。”

出租这些场所，除了筹集资金，是否还有其他好处？

这些活动可能带来文化惠益，让那些本不会来此的公众来到这里，让他们有机会探索这处遗址，或许还能让他们燃起回到这里进行一次深度探索的欲望。

一些国际文件规定，遗址必须为公众利益服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67年制定的《基多准则》强调了遗址的经济价值，并指出历史遗迹可作为旅游景点，和自然资源一样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是有关拉丁美洲历史遗迹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因此，50多年来，我们已经知道遗址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它可以产生收入，而这种收入又应当用于推动遗址的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坎波别墅观察站允许出租它的某些设施。您认为我们应当以何种方式管理这项活动？**

关于奥坎波别墅的用途，有一份非常行之有效的协议——分区式系统，规定哪些区域在何种情况下可供使用。比如，不允许在该处遗址的房间内举办私人活动。

阿根廷作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没有把她的房屋当作博物馆，而是当作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她接待宾客、举行会议与招待会。如今，此地出租之后，这段历史将成为永恒。

**阿尔弗雷多·孔蒂（阿根廷）** 建筑师，城市规划师，2010—2017年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理事长，现为遗产和可持续旅游研究生课程学术指导、教科文组织文化旅游教席，兼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科学调查委员会研究员、拉普拉塔大学旅游研究所负责人。

**弗雷德里克·瓦舍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坎波别墅主管。



奥坎波别墅的爵士之夜（2016年）。

在美洲，哥伦比亚波哥大有这样的实例。位于历史中心地带的曼萨纳文化区包括几个设在殖民建筑物中的重要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在开馆时间之外可供租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附近的弗农山庄是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但很轻松就可以在网上预定一晚。

## 奥坎波别墅，教科文组织阿根廷代表处

1947年，阿根廷知识分子和慈善家维多利亚·奥坎波（Victoria Ocampo, 1890—1979年）接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此次会面让她认识到，她关于妇女权利的观点和对他人观点持有的开放态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想相契合。1973年，她将奥坎波别墅，也就是她在圣伊西德罗的住宅——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捐献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今天，奥坎波别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科学办事处在阿根廷的办公地。它既是研究和辩论场所，也是博物馆和文献中心，拥有11000多册藏书，2500份期刊和1000张照片。2017年，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文献遗产计划——《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2015年启动的奥坎波别墅跨大西洋对话计划，促使它发挥观点观察站和实验室的作用。

# SESAME:

## 中东科学成就

阿奴·艾尔-邹比

《信使》杂志谨以此文纪念联合国“争取和平与发展世界科学日”（11月10日）。

2017年5月16日，SESAME国际科学研究中心在约旦阿兰成立，它是中东及邻国首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同步加速器光源研究中心。这个开创性项目历经十四年艰苦建设、凝聚八国力量，最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建成，它旨在实现一个双重目标——巩固本地区科学成就，促进不同文化、政治和宗教背景的科学家进行跨境合作、对话与理解。

中东同步加速器辐射促进实验科学及应用科学国际中心（SESAME）是中东地区建立的首个此类国际中心。同步加速器光源如同一个强大的高精度科研显微镜，通过它，电子可以在中空磁化环中加速，并很快达到光速。这些电子在加速时会产生密集强光束。这些粒子束被储存并导向研究样本，因为它们能帮助研究人员全新、深入地理解研究样本。该中心的研究领域从物理学到分子化学及纳米科学，研究成果应用于考古、环境科学、农业、工程、药理、医学和工业等多个领域。近年来，同步加速器的晶体学研究催生了五项诺贝尔奖。

来自中东的科学家——无论其专业、国籍或宗教信仰如何——将再也不用为开展各自的研究而远赴他国的主要研究中心。他们再也不会因本地区缺乏先进设备而放弃自己的研究兴趣。

中东同步加速器辐射促进实验科学及应用科学国际中心（SESAME）360度全景图（2017年12月，约旦）。







在 SESAME 中心，他们可以利用同步辐射来研究样本，在不同的科学领域实现新突破，分析各自的成果并交换数据。通过该中心，科学家们可以与本地区的其他研究员，以及在全球 25 个国家的 60 多台同步加速器设备上工作的研究员建立研究网络。全球大约有五万名研究员使用同步加速器设备工作。

SESAME 是一个政府间中心，有八个成员国，分别是塞浦路斯、埃及、伊朗、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该中心还得到以下观察员国的支持：巴西、加拿大、欧洲核子研究组织、中国、欧盟、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科威特、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截至 2017 年 5 月，该项目总共投入了近 9 000 万美元。

SESAME 中心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体现在：首先，它标志着中东地区严谨的科学研究在沉寂多年之后重回 13 世纪的辉煌。该中心犹如一缕希望之光，照亮了这片土地，驱散了动荡、政治冲突、恐怖主义和经济萧条的阴霾，让中东得以重新聚焦科研、合作与共赢。

## SESAME: 一个特殊的成功故事

让我们从一个科学事实说起：水在 99 度时仅仅是热的，而只有达到 100 度时才会沸腾或产生蒸汽。蒸汽为火车和工厂提供动力，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小小的一度之差就会产生天壤之别，甚至能掀起一场工业革命。

我们的生活也逃不开这则定律——光做到成功远远不够，要作出真正的改变并取得卓越成就，还需要在成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在传统等式中，成功是耐心、充足准备和决心的总和，但在尖端科学的残酷竞争中，还需要一些额外的东西——创造力或超越平凡的能力。正是这“一度”区分了令人满意与卓尔不凡的成就。

这正是 SESAME 加速器的故事。拥有这一梦想的研究人员在萌发这种想法后便投入全部精力，一步步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筹集必要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培训员工、制订并执行工作计划……日复一日，直到该中心落成。如果没有这些参与者——从个人到国家及机构的参与，如果没有他们作出的这些努力，这项开拓性的科学成就将永远无法实现。

从认识到中东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高级研究中心那一刻起，科学家们就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奋斗。1997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国家加速器实验室（SLAC）的赫尔曼·温尼克（Herman Winick）和德国同步加速器中心的古斯塔夫·阿道夫·沃斯（Gustav Adolf Voss）提议，德国 Bessy I 加速器在 1999 年退役后，将被捐赠给中东地区，以提供电子加速器原子核。这一提议在科学界广受好评。中东科学合作组织负责人塞尔焦·富比尼（Sergio Fubini）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前任总干事赫维希·朔佩尔（Herwig Schopper）一同向德国政府递交了此项提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证为 SESAME 的建立提供支持，并承担设备拆解及从德国到约旦的运输费用之后，德国政府批准了该项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9 年启动该项目，并于三年之后正式宣布负责赞助加速器的建造，因为该项目符合其宗旨，即通过教育、文化和科学加强安全、和平与国际合作。



© CERN/Noemi Caraban

## 人道主义战胜分歧

从 2003 年建设启动到 2017 年落成，在时任 SESAME 理事会主席克里斯·卢埃林·史密斯（Chris Llewellyn Smith）和中心主管哈立德·图康（Khaled Toukan）的领导下，SESAME 的建设得到了包括参与国、观察员国和捐助国在内的各方的长期支持。约旦提供了土地并承担了中心建筑的建造费用。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为研究人员及工作人员提供了专业的高级培训和奖学金。欧洲联盟提供了 1800 万美金的资金。在 SESAME 存储环磁性系统的建造过程中，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以其丰富的经验为该中心提供了指导。世界各地的组织、国家和同步加速器中心等其他合作伙伴也提供了建议、专业知识、计划和设备，从而完美地诠释了团结、合作、慷慨和创造精神。

在 2017 年 5 月 16 日的启动仪式上，在欢乐、热情、自豪和向上的气氛中，依然有人感到不安。他们担心，14 年艰苦奋斗中所遇到的所有障碍都克服了吗？答案必然是肯定的——科学在服务人类的同时，有能力将大家团结起来，超越分歧。

## 太阳能供电

SESAME 同步加速器中心的特殊性不仅仅在于它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此类中心，或是它成功地使身陷矛盾冲突地区的人民对科学产生兴趣，还在于它是首个由太阳能驱动的科学实验室。

此外，至少有 750 名来自中东地区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从 SESAME 中受益。他们在科学先进的国家的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参加专业的培训课程。通过这种方式，该中心保护了该地区的科学资源，遏制了人才外流，同时加强了这些研究人员在各自国家科学和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

通过以低成本培养科研能力并增加在研项目的数量，该中心还提高了该地区大学和研究中心的科学教学与研究水平。在严格的科学范畴之上，它还是东西方文化与南北半球文化之间的桥梁。

吉昂·卡迈勒（Gihan Kamel），SESAME 中心的研究员，正在红外束线实验室观测粒子。

在首轮束流时间应用征集中，该中心收到了关于使用头两个粒子束的 55 项申请。如今，来自该地区的研究人员能够在诸多不同科学领域有所建树，包括疾病早期诊断与治疗，考古学、植物疾病识别与治疗，以及在不动摇的前提下古代手稿分析。

前方还有其他挑战需要攻克——进一步发展用户社群、开发新型粒子辐射束、整合中心设施，包括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此外，还需要找到供货方为该中心提供运营资金。但是，这些挑战都不会让那些信任该项目及其目标的人气馁，因为它既代表着科学的胜利，也是共同世界和人道理念的体现。

阿奴·艾尔-邹比（约旦）记者兼通讯专家，同时也是视听资讯领域的专业人士。她是约旦国家电视台多个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并于 2014 年获得开罗阿拉伯媒体节金奖。



CC BY 2.0 photo: Dean Calma / IAEA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 教科文组织在

# 乍得湖畔



© Aboukar Mahamat

### 阿涅丝·巴尔东 (UNESCO)

2018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一个重大项目，旨在加强乍得湖盆地人民的灾后复原能力。过去40年来，一场重大干旱曾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乍得湖生物圈与遗产 (BIOPALT) 项目为自身制订了一个远大目标——让当地居民在乍得湖沿岸安居乐业。2018年2月26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该项目，旨在对该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评估，从而以更可持续性的方式加以管理。此外，还将在该地区开展试点行动，恢复各类生态系统，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当前面临的挑战十分艰巨。乍得湖水系是4000多万人的淡水来源。1960年至1985年，该流域的降水量减少，导致湖面面积缩小了90%以上。湖水急剧干涸给当地的环境和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数以千计的人因此陷入贫困，不得不背井离乡，逃离这个地方冲突频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地区。

乍得湖生物圈与遗产项目拥有相应预算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三年来，非洲开发银行已向五个相关国家——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拨付了近650万美元。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与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共同落实该项目，后者负责协调该盆地水资源共享国之间的行动。

乍得湖生物圈与遗产项目计划勘测该地区的水资源，恢复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利亚之间的野生动物（尤其是大象）迁徙走廊。该项目还计划恢

喀麦隆瓦扎-洛贡泛洪区，达贾罗社群在捕鱼。

复湿地来应对水资源枯竭，并鼓励开展螺旋藻（在该地区历来由女性采集的绿藻）种植等创收活动。其他行动还包括保护乍得湖的特有生物——库里牛 (Kouri cow)。

这一项目还旨在鼓励沿湖各国共同努力，使乍得湖日后能被选定为跨境生物圈保护区。此外，项目旨在增强地方性技能，让这些国家能够提名遗址以供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帮助各国确定其非物质文化遗产。

社会凝聚力是该项目将要解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年度会议（或湖边会谈）将使各个年龄段、不同族裔和宗教信仰的人相聚一堂，让他们各抒己见。

## 纪念我的祖父桑迪·科夫勒



© Archives Sandy Koffler

桑迪·科夫勒在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摄于 20 世纪 70 年代）。

### 奥雷利娅·多斯

201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庆祝其第一期杂志出版（于 1948 年 2 月出版）70 周年。为纪念这个特别的日子，《信使》杂志向其创办者桑迪·科夫勒（Sandy Koffler, 1916—2002 年）致以崇高敬意，邀请他的孙女奥雷利娅·多斯（Aurélia Dausse）分享她对祖父的回忆和他的笔记摘录。

在我的印象中，祖父永远在书堆里。他手边总备着词典。其实他通晓多种语言，精通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和汉语。我常见他在一本黑色大词典上做笔记——他的汉语词典。汉语是他最钟爱的语言，他能讲七种方言！意外的是，他竟允许我们在他的字典上涂写。因为他，书本有了生命，不再是仅供使用的工具，而像是家庭成员，在我们用餐时随时都会来到餐桌上。

桑迪思维敏捷、充满热情、富有想象力和好奇心。他总在学习新事物，喜欢同家人和朋友（人越多越好）分享学习的乐趣。

这就是他作为一名新闻撰稿人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在创办《信使》的岁月里，更是如此。

桑迪于 2002 年去世。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宝藏，这是我最近着手研究家族史时发现的，他个人的战争日记、书信、笔记本、照片和一套完整的《信使》合订本。这里面有许多细小的生活片段，讲述了这位杰出者的非凡旅程。能够在他创办并主导了 30 年（1948 年 2 月—1977 年 1 月）的期刊中撰文向他致敬，我深受感动。

## 从纽约到巴黎， 再从巴黎回到纽约

桑迪·科夫勒生于纽约，父母是来自罗马尼亚布科维纳的切尔诺夫策（今乌克兰西部城市）。同许多移民一样，他们从埃利斯岛登陆美国。联邦移民局就设在纽约港内的这座小岛上。他的父亲伯尔·科夫勒（Berl Koffler）起初只是在大街上出售苏打水，后来成为纽约有名的拉比，并搬到了布鲁克林区的威廉堡。1916年10月24日，桑迪在那里出生了。

从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后，桑迪获得了到巴黎索邦大学留学的奖学金。1940年，他在波尔多学习期间，美国领事馆因为他是犹太人建议他离开法国。桑迪不愿离开，因为他热爱法国的文化和语言，更因为这里有他的爱情。他以为美国公民身份能保护自己。但是当纳粹入侵法国时，他最终还是前往马赛，登上最后一批驶向美国的轮船。轮船在葡萄牙长时间停留，桑迪抓住机会学习了葡萄牙语。

### 在纽约的生活

回到纽约以后，桑迪成为《美利坚》周刊的兼职专栏作家，还学会了版画复制技巧。大约在这个时候，他参加了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举办的讲习班。列维-斯特劳斯也是在德国占领法国之前离开法国的，于是他们两人成为了朋友。

几年后，他们在巴黎重逢——一人成为了《信使》主编，另一人参与了第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种族问题声明》（1950年）的起草，撰写了《种族与历史》（1952年）这部反对种族主义的经典巨著。20世纪50年代，桑迪定期邀请后者向《信使》投稿，因此，许多极为重要的人类学文章在被重印成册之前已在《信使》上发表。（编者按：《信使》杂志在2008年出版了题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远观》的特刊，其中收录了列维-斯特劳斯的大部分文章。）



在巴黎马杰斯提克酒店举行的《信使》杂志发布会上，桑迪·科夫勒（左数第二）与整个《信使》团队（1945—1958年）。

战争促使桑迪与美国陆军心理战部门（PWB）签约并为其工作。他在战争情报局（OWI，美国政府的一个情报机构）接受培训，利用现代大众宣传方法传播和平主义思想。他被派往拉巴特（摩洛哥首都），登上了一艘在大西洋战役期间为盟军运送补给物资的美国（海军货物）自由号轮船。他在那里担任无线电广播“美国之音”的通讯员和信息主任，开发了一档24小时播报世界新闻的节目。1944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热爱这份工作，我觉得它很有意义，值得去做。”

桑迪随后被派往意大利，在那里，他创办了一份时事通讯，向人们通报盟军取得的进展，宣传和平。通讯的名称为《罗马信使》《威尼斯信使》《威尼斯托信使》或《艾米利亚（博洛尼亚）信使》，这取决于它在哪个获得解放的城市或地区出版。

### 《信使》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桑迪回到法国，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新创立的国际组织产生了兴趣。这个组织旨在通过科学和文化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促进和平，它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间引起了轰动。它的总部设在巴黎克莱贝尔大街19号的马热斯蒂克旅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月以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一份两页篇幅的宽页黑白报纸《监督者》。1947年10月26日，这位年轻的记者和专栏作家供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开始了工作，那天他刚好31岁。

同年11月19日前，他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众宣传局的首任局长哈罗德·卡普兰（Harold Kaplan）提交了关于创办一份期刊的提案，阐述了编辑流程、出版周期、不同板块概览、每个页面的专栏数量、文章篇幅及字体。总之，这是一个完整项目，将成为另一个“信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

他写道：“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非常多元化，其项目涵盖大量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的极重要的主题，因此，收集生动有趣的文章并不困难。”他志向远大，不想把杂志的内容局限在教科文组织的行动上，而是想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评论、教科文组织及文化科学界的领军人物访谈，以及各国专家撰写的深度文章。

他建议为法文版和西文版聘用资深编辑，如此，这两个版本就不会再只是英文版的简单复制品，或比英文版略显逊色。他承诺“确保这份杂志符合向公众出售的高标准”。

桑迪以最短的时间在所有方面取得了成功。1948年2月，第一期内容满满并带有插图的《信使》由《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巴黎印制。欧洲、亚洲和美洲15个国家的代理商向国际读者提供半年期订阅服务。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期刊之一就此诞生。

## 《信使》传播

1957年，《信使》开展国际业务，它的第一份“地方”期刊在莫斯科出版。这为其他国家理清了跟进的道路。1960年，德文版在伯尔尼发行。1961年，阿拉伯文版和日文版分别在开罗和东京发行。1963年，意大利文版在罗马发行。1967年，印地语版和泰米尔语版在印度发行。1968年至1973年，《信使》又增加了希伯来文、波斯文、荷兰文、葡萄牙文和土耳其文版本。1977年2月桑迪退休时，《信使》已有15种语言版本。1988年，杂志版本数量创历史新高，达35种。

对桑迪来说，增加版本数量是为人们搭建桥梁的一种方式。泰米尔语版发行时，他在印度马德拉斯（现在的金奈）如是说：“从前，各个民族都以自我为中心。过去20年里，我们目睹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现象，各国纷纷突破边界，眺望远方的地平线，遥望世界的各个角落，合作以求和平与理解。这是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家庭努力实现的宗旨。今天下午，我有幸见到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他告诉我，马德拉斯已同意我们的申请并批准出版泰米尔语版《信使》。作为《信

使》主编，听到他的这番话，我热血沸腾，因为这是一项成就。”

## 桑迪的忠诚

毋庸置疑，桑迪·科夫勒是一位伟大的专业人员，天生拥有出色的人际交往能力。身为20世纪标志性领军人物，如瑞士人种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étraux）和美国工程师兼画家弗兰克·马林纳（Frank Malina），他们都是桑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同事兼密友。他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七位总干事的赏识，其中勒内·马厄称他是“才华与信念并存”的人。

桑迪·科夫勒意志坚定、魅力非凡，他孜孜不倦地为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和平理想而奋斗，始终保持警惕，以保持政治立场中立，即使是在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他是个执拗的人。他的第二任妻子波琳·科夫勒（Pauline Koffler）说：“他从不听命于人，哪怕是美国最高外交官员和政务官员；他从不妥协，也毫不动摇，这给他惹了不少麻烦。”

## 世界公民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9年的一份行政文件中，我读到了对桑迪的一些评价：“他的职业能力、专业素养、创造力、首创精神和想象力使他成为一名杰出的记者和主编。他拥有强烈的责任感、完备的职业良知、作为组织者和领导的公认素质，以及成为主管人员所必需的能力。”

另一份不太正式、未标明日期也未经签署的档案文件揭示了桑迪性格的另一面：“桑迪对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及其理想的忠诚确实显而易见又不可撼动。平时在城里，很少见到埃米尔·德拉弗奈（Émile Delavenay）、托尔·耶斯达尔（Thor Gjesdal）和桑迪·科夫勒这三位同事聚会，但我记得，每年10月24日大概正午时分，他们会到巴黎的一家餐馆聚餐，庆祝彼此的生日，还特别举杯庆祝《联合国宪章》生效的周年纪念日。”

就我而言，我一直很敬佩祖父，倾慕他的才智和品格。我很感激他把自己对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忠诚、对书籍的热爱以及对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痴迷传递了下去。

深入研究他的个人档案和专业档案，我不禁想重新讲述这位热爱法国、总是对我说“总之，我是一位世界公民”的美国人的迷人故事，想把它制成一部纪录片——目前，我正在做这件事。

**奥雷利娅·多斯** 法裔美国导演、编剧和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创办者桑迪·科夫勒的孙女。

## 《信使》以35种语言发行!

你应该看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时任主编爱德华·格利桑（Édouard Glissant, 1982—1988年任职）在得知这本杂志又增加了一个语言版本时脸上洋溢的喜悦！你应该看看他脸上的幸福，听听他颤抖的声音：“35种不同的语言，你能想象吗！”只有在那时，你才能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捍卫的理想对他来说有多重要，才能理解这本从1982年到1988年，他一直满怀激情地指导着的杂志，在他的思想和工作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2017年5月，与爱德华·格利桑的夫人赛尔维·格利桑（Sylvie Glissant）的访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少数民族特刊僧伽罗语版封面，1993年6月。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

[www.unesco.org/publishing](http://www.unesco.org/publishing)  
[publishing.promotion@unesco.org](mailto:publishing.promotion@unesco.org)



## 《世界遗产》第 88 期

巴林世界遗产（特刊）

ISSN 1020-4202

72 页，22 厘米 x 28 厘米，平装，7.50 欧元

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2 届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4 日在巴林麦纳麦举行。本期特刊将带您走进巴林，探访它的历史与文化遗产。

本期特刊特以专题形式介绍巴林的两处世界遗产：巴林堡——迪尔蒙国的古港口和首都，以及采珠业——岛屿经济的见证。特刊近距离呈现了这些遗址及其保存状况，并揭开了巴林遗产鲜为人知的一面。



## 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

采用循证方式

978-92-3-500020-7

140 页，21 厘米 x 29.7 厘米，平装，PDF 可登陆 <http://unesdoc.unesco.org> 查阅

《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于 2009 年首次出版，为学校、教师和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一种循证方式。

认识到自纲要出版以来性教育领域的内容发生了动态变化，联合国联合出版合作伙伴扩展小组审查并修订了纲要内容，以适应青春期学习者当前的需求，并为教育系统以及寻求解决这些需求的教育工作者提供支持。



## 教育部门针对饮酒、吸烟和吸毒问题的应对措施

健康教育领域的良好政策与实践

ISBN 978-92-3-500019-1

68 页，21 厘米 x 29.7 厘米，平装，PDF 可登陆 <http://unesdoc.unesco.org> 查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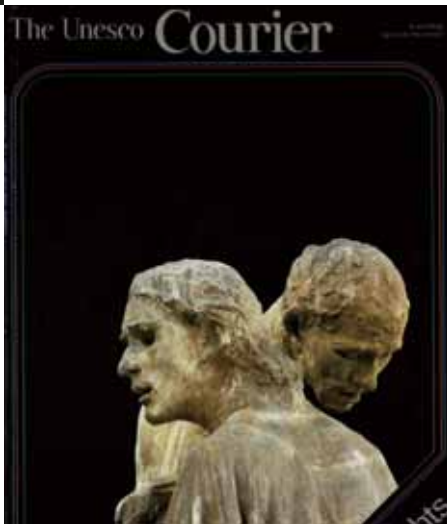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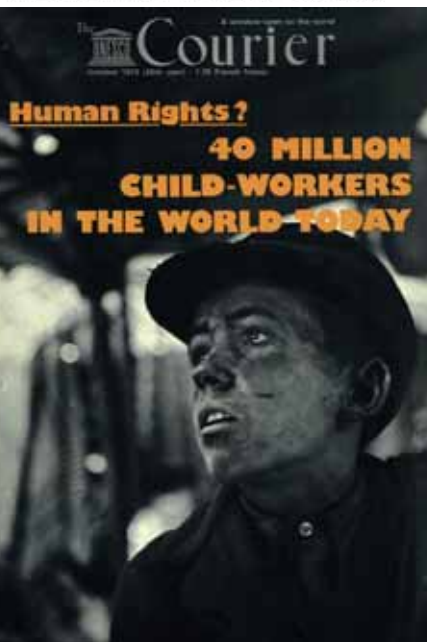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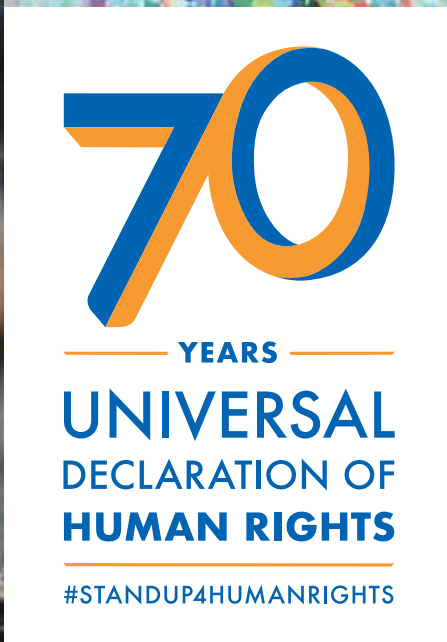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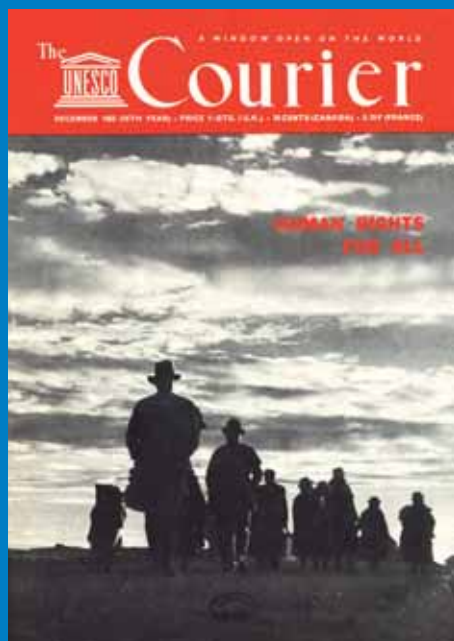
本出版物系通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并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及联合国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机构间工作队成员共同参与的国际磋商进程编拟。

本出版物为改进教育部门针对吸毒问题的对策提供了背景和依据，介绍了循证和有前景的政策与做法，并提出了在维护和扩充有效对策时需考虑的问题。

### 勘 误 公 告

在 2018 年第 3 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杂志第 7 页中，由于疏忽，有关字节的数字表述出现错误：10<sup>12</sup> 字节、10<sup>15</sup> 字节应为 10<sup>12</sup> 字节、10<sup>15</sup> 字节。特此说明。为您阅读带来了不便，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 《信使》70周年 用其篇章颂扬人权！



订阅《信使》中文版请与以下地址联系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010) 68359101 邮编：100044

ISSN 2096-4064  
CN 10-1517/C  
定价：36.00元